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6 期（民國 98 年 12 月），1-5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產業集聚與城市區位鞏固： 徽州茶務都會屯溪發展史(1577-1949)<sup>\*</sup>

鄒 怡<sup>\*\*</sup>

## 摘要

本文回顧了徽州新安江流域茶業中心城市屯溪的崛起與發展歷程。明代弘治年間，屯溪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街市。明代後期，源自休寧的松蘿茶帶動了休寧茶業的興盛，屯溪作為縣內水路中樞，成為政府茶葉引票管理機關巡檢司的駐地，而當時位於屯溪下游的歙縣茶產，一般並不過境屯溪。十八世紀以後，廣州外銷興起，在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背景下，下游的茶產也逆流過境屯溪轉運廣州，從而推動屯溪的進一步發展。茶業周邊產業隨之大量集聚，更加鞏固了屯溪的茶業中心地位。1842 年上海開埠之後，即便下游茶產可以直接運往上海，屯溪以其產業服務優勢，依然吸引了下游茶產逆流而上至屯溪精製，再集中轉運上海。同時，產業移民的集中也進一步推動了屯溪生活服務產業的繁榮和城區的擴大。統觀屯溪的發展歷程，最初的崛起乃基於其所處的腹地交通中心地位，然而隨著屯溪實力的增強，輻射面的擴大，其實在位置日益偏離新的腹地中心，但已有的產業基礎繼續鞏固加強著屯溪的城市區位。這一經驗表明，經濟的空間布局中同樣存在著與制度演進相似的「路徑依賴」現象。1929 年遭土匪洗劫焚毀的屯溪，在三年之內迅速恢復，這一事件作為屯溪城市發展史的濃縮版，不啻為以上結論提供又一有力證據。

關鍵詞：徽州、屯溪、茶、路徑依賴、城市史

\* 本文受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項基金資助，項目編號：20090096。同時，論文審查期間，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與相當有啟發的問題點，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9 年 8 月 2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年 10 月 19 日。

\*\*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講師

## 一、導 言

徽州，在今安徽省南部，大體包括今天安徽省黃山市的歙縣、休寧、祁門、黟縣，宣城市的績溪，以及江西省上饒市的婺源。這六縣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至民國元年(1912)的 791 年間，穩定地同屬於徽州這一個統縣政區。<sup>1</sup>

明清時期，徽州以「無徽不成鎮」的徽商而聞名，「鹽、典、茶、木」是徽商的四大經營強項。早在唐代，當地就已成為茶葉的大宗出產地，楊曄所著《膳夫經手錄》中提到：「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置製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並間，人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資，數千里不絕於道路。其所出之含膏，亦在顧諸之亞。」<sup>2</sup>五代時期，茶課甚至成為藩鎮割據勢力與當地豪族武裝自衛的養命之源，並為此而展開了對茶葉壟斷權的爭奪。<sup>3</sup>明代以後，中國茶葉全面進入炒青時代。<sup>4</sup>隆慶年間，徽州茶人引進蘇州虎丘茶的炒青工藝，創製了松蘿茶。<sup>5</sup>在同期興起的徽商及交遊文人的推波助瀾之下，徽州茶成為風雅生活的象徵而備受推崇，至明末清初躍居全國一線名茶之列。<sup>6</sup>及至 1920 年代，在日本人的中國觀察紀錄中還提到，當時市面上，武夷、龍井、雨前、松蘿和蘿山是茶葉鋪招牌上最常見的幾種茶名，其中，松蘿就是徽州茶的一種。<sup>7</sup>

<sup>1</sup> 北宋的統縣政區為「州」，故「徽州」一詞中「徽」為專名、「州」為通名。此後，各朝統縣政區的通名發生變化，「徽州」一詞演化為一個完整的專名，在作為行政區劃名稱時，「徽州」一詞後又疊加上當時的政區通名，如元至元十四年到至正十七年(1277-1357)稱為「徽州路」，元至正二十四年至民國元年(1364-1912)稱為「徽州府」。期間，僅元至正十七至二十四年(1357-1364)曾短暫地改稱為「興安府」。參見安徽省徽州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徽州地區簡志》（合肥：黃山書社，1989），頁 54。

<sup>2</sup> [唐] 楊曄，《膳夫經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影印，199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115，頁 5 上，頁 525 上。

<sup>3</sup> [日] 山根直生，〈唐末五代の徽州における地域發達と政治的再編〉，《東方學》，輯 103（2002 年 1 月），頁 80-97。

<sup>4</sup> 陳祖釩、朱自振編，〈導言〉，《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 21。

<sup>5</sup> 陳椽，〈揚名中外的鄉源松蘿〉，《安徽茶經》（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頁 41-44。

<sup>6</sup> 吳智和，〈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明史研究專刊》，期 2（1980 年 9 月）；鄒怡，「松蘿山、松蘿茶與松蘿法——清中葉以前徽州名茶歷史的初步梳理」，《明清以來徽州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6），頁 50-52。

<sup>7</sup> 〈支那の字號、招牌、門票牌子に就て〉，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經濟月報》，總第 1 期（1927）。

大航海時代開啓了中西貿易的巨流，其中，茶葉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那個時代，徽州成為專供出口的洋莊綠茶的重要產區，1870 年代，祁門縣又創製了蜚聲中外的祁門紅茶，成為洋莊紅茶的特色產區。1875 年，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的專家曾對中國茶區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在專家開列的綠茶名目中，有一種英文名為 Twankay 的茶葉，該名字即來源於著名的徽州茶市——屯溪。<sup>8</sup>

屯溪所在的徽州地處萬山之中，海拔 400 米左右的丘陵雁行陣列，<sup>9</sup>全年  $\geq 10^{\circ}\text{C}$  積溫在  $4,800\text{-}5,200^{\circ}\text{C}$  之間，年降雨量約為 1,200-1,600 毫米，地表覆蓋著 pH 值 4.0-6.0 的弱酸紅壤。<sup>10</sup>總體而言，該地區的水熱、地貌和土壤理化性質，均處於茶樹生長所需自然條件的最佳值域之內。<sup>11</sup>

將觀察尺度縮至徽州內部，茶業在當地的具體分布，基於山形水勢，又可分為兩大區塊。有一段清末安徽鄉土地理的描述，用平實的語言概括了皖南的地貌大勢：

皖南地面，既分四府一州，<sup>12</sup>有兩府靠著長江，<sup>13</sup>其餘兩府一州，不靠長江，多在山中，所以人貨往來，不能有靠長江兩府的便當了。但是

---

年 1 月），頁 4。作者將「雨前」標為安徽省徽州產的名茶。實際上，「雨前」是綠茶的一個通名，指採摘於「穀雨」前的綠茶，許多地方的綠茶均有雨前的名稱。當然，徽州綠茶中也有「雨前」的名號。同時，作者誤將松蘿的產地標為「安徽省婺州」，婺州為今之浙江金華，故此處可能應指「安徽省婺源」，婺源為徽州綠茶的重要產地。另有可能與前面所提「雨前」的產地相同，實應為「安徽省徽州」。

<sup>8</sup> H. G. Hollingworth, "List of the Principal Tea Districts in China and Notes on the Name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Black and Green Te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1875), p. 12.

<sup>9</sup> 中國科學院南方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第三分隊，《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區國土開發與整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 264-267。安徽省徽州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徽州地區簡志》，頁 57-59。

<sup>10</sup> 中國科學院南方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第三分隊，《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區國土開發與整治研究》，頁 76-77。

<sup>11</sup> 安徽省屯溪茶業學校編，《茶樹栽培學（茶葉專業適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頁 46-58。

<sup>12</sup> 四府一州為太平府、池州府、甯國府、徽州府和廣德州。

<sup>13</sup> 指太平府和池州府。

甯國縣、旌德縣、太平縣、黟縣諸處，有一帶很〔很〕高的山，這種山在地理學家講起來，叫他為分水脊，因為這種高山，必將流水分向兩面。所以皖南一部，太平府、甯國府、池州府的水，多係流往長江。徽州一府，歙縣、績溪縣、休寧縣的水，卻係流入浙江省的錢塘江，祁門縣、婺源縣、黟縣的水，<sup>14</sup>那係流入江西省饒州府地方的鄱陽湖，再流入長江。這些水道所以分流的原故，全係被山勢隔斷的。看官，你若曉得皖南各處水流的原故，也就明白皖南各處很有許多山，更可以明白皖南各地出入的路了。<sup>15</sup>

若結合現代地理科學的語言進行解釋，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整個徽州地區週邊，天目山——白際山山系、黃山山系和五龍山脈首尾連通，形成一個分水嶺包圍圈，其中黃山山系西南段和五龍山脈又並不完全居於徽州邊境，而是分別綿延於祁門——休寧和婺源——休寧縣界一線。由此，徽州內部被這兩段山脈分隔為兩個流域：歙縣、休寧、績溪和黟縣的大部屬新安江流域，祁門和婺源則位於分水嶺西側而屬於鄱陽湖流域。其中，東部新安江流域生產洋莊綠茶，以屯溪為製造中心，<sup>16</sup>而西部鄱陽湖流域的婺源和祁門兩縣，分別以洋莊綠茶和紅茶而聞名，但是其製造散布縣下各村鎮，沒有形成單一的產業中心。<sup>17</sup>

這樣的產業布局與流域地貌特點密切相關。相對而言，鄱陽湖流域的水道比較散漫。閩江、大北河、新安河及文閃河，在分水嶺西北側的祁門縣境內各自成流，進入江西境內後，漸次匯入楊村河，注入鄱陽湖。分水嶺南側的婺源縣，清華水、段莘水和江灣河逐漸匯成樂安江後，沿縣境西流，途中又有高砂水、橫槎水和賦春水陸續匯入，由於各河道間各有山脈阻隔，河口相距較遠，

<sup>14</sup> 此處有誤，黟縣因黃山山脈貫中穿越，南北兩麓水系分屬青弋江流域和新安江流域，青弋江注入長江，故青弋江流域實為長江流域之一部。參見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黟縣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51。

<sup>15</sup> 〈安徽地理說略〉，《安徽俗話報》，期12（1904年9月），頁13-14。

<sup>16</sup> 參見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上海：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1934）。

<sup>17</sup> 參見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編，《祁門紅茶之生產製造及運銷》（南京：編者印行，1936）。

故整個水系亦呈鬆散局面。而新安江流域的格局與之相反，發源於流域東端的率水、橫江在屯溪匯流成漸江，源出流域北部的豐樂水、富資水、布射水和揚子水在歙縣縣城，也就是明清兩代徽州府的府城——徽城鎮——附近合流為練江，練江與漸江在徽城鎮南鄰的浦口匯合成新安江，東流過街口，穿越天目山脈與白際山脈之間的缺口，進入浙江境內。總體言之，在新安江流域內，屯溪以上的率水和橫江溝通了黟縣和休寧，而練江溝通了績溪和歙縣，兩水匯總成為新安江，入浙西，往杭州，成為歙縣、休寧、黟縣和績溪四縣通過水路突破分水嶺屏障的總通道，構成一個集束型水系。因此，婺源和祁門兩縣多中心式的茶業布局可歸因於徽州鄱陽湖流域的散漫型水系結構，與之對應，新安江流域屯溪單中心局面的形成則根源於該流域集束型的水系結構。<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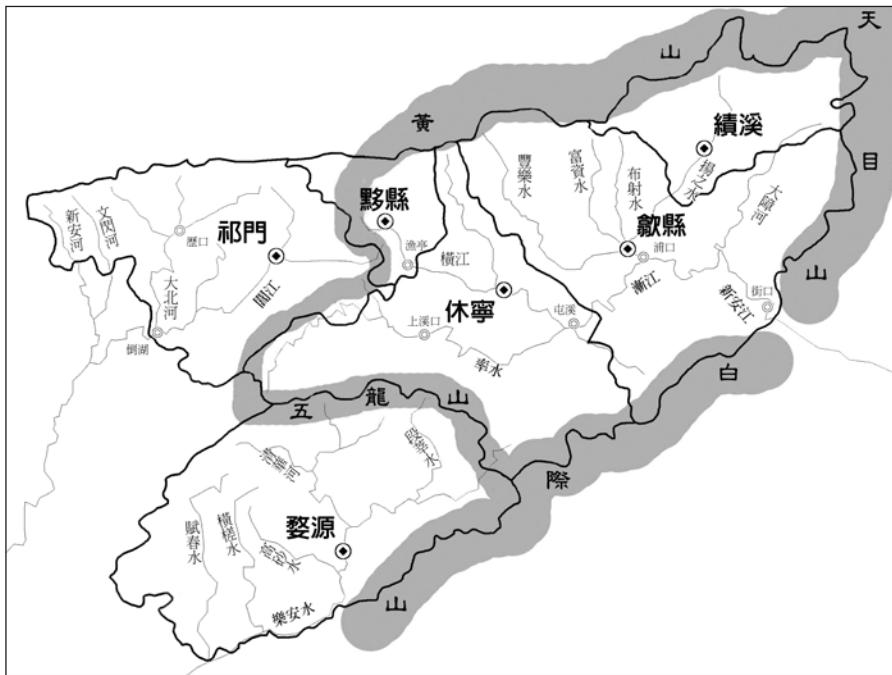
但是，細究其中的分析邏輯，實際上只是回答了徽州新安江流域的茶業何以會偏向於形成單中心格局。若進一步追問，這一中心為何會選擇在屯溪，依然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若僅從水系結構觀之，新安江流域內漸江和練江合流點附近的徽城鎮，更具有新安江上游總鎖鑰的地位。而在歷史上，徽城鎮也確實長期擔當了徽州地區行政中心的角色。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將包括地理架構的靜默的長時段要素視為界限人類歷史活動的包絡線，<sup>19</sup>並提醒史學工作者要謹慎地對待時間，不要只考慮短時段，不要只相信最吵鬧的演員，而需將目光更多投射於那些長期默默無聲的演員。<sup>20</sup>但屯溪與水系總鎖鑰位置的相離，恰恰暗示了在該研究中若僅從地理要素出發，尚不足以解釋該歷史現象。故本文將在地理分析的基礎上，回身反觀在歷史進程中最吵鬧的角色，嘗試對這一未盡之課題做出合理的分析。

<sup>18</sup> 徽州地區新安江流域和鄱陽湖流域茶業布局及其與水系結構關係的詳細分析，可參見鄒怡，「徽州六縣的茶葉栽培與茶業分佈——基於民國時期的調查材料」，〈明清以來徽州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6），頁 98-100。

<sup>19</sup>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收入氏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4。

<sup>20</sup>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論歷史》，頁 41。

圖 1 徽州六縣的河道與山脈



圖片說明：筆者繪製。基礎數據採自《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

## 二、遠在廣州的拉力

屯溪是今黃山市市政府所在地，大體相當於舊徽州地區的行政中心。但是，遲至 1932 年 12 月 1 日，安徽省第十行政督察公署暨保安司令部在屯溪正式成立，<sup>21</sup>屯溪在徽州地區才成為行政中心，第十行政督察區的管轄範圍即舊徽州府的六縣。而屯溪的建市是在 1949 年 5 月 13 日，目前的政區格局，屯溪作為地級黃山市市政府所在地則始於 1987 年 11 月。<sup>22</sup>總之，屯溪在行政級別地位上的確立，是近半個多世紀內的事情。回望歷史，在更長一段時間內，屯

<sup>21</sup> 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頁 8。

<sup>22</sup> 其間屯溪的行政等級多次上下調整，參見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 30。

溪並不是徽州地區的行政中心，甚至不是休寧縣的行政中心。明弘治《休寧縣志》中，關於屯溪的專門記載只有短短的一條：「屯溪街，在縣東南三十里」，<sup>23</sup> 與目前屯溪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這不禁令我們對近四百年內屯溪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動因產生無限的好奇。

在清中葉以前徽州名茶的發展史中，發源於休寧松蘿山的松蘿茶對徽州茶業具有強大的推進作用。<sup>24</sup>松蘿茶創製後，休寧縣內各山紛紛仿效松蘿製法，形成南源、北源等名色。雖然乾嘉之際的江依濂、江紹蓮在〈歙風俗禮教考〉中談及當時的松蘿茶「胥販之於歙，而休山轉無過問者矣」，<sup>25</sup>但歙縣茶大行於市，是較為晚近的事情。據民國《歙縣志》中的回憶，「歙土宜茶，而道光八年前出產無多」，<sup>26</sup>故明隆慶年間創製的松蘿茶首先帶動發展的是休寧的茶業。明清兩代，茶葉的運銷實行引由專賣制度，茶引由戶部頒發給安徽布政司，再由布政司發給徽州的辦茶商人，茶葉販運出境時，由設於水路要衝的巡檢司對引票驗實截角後放行。<sup>27</sup>故巡檢司的設立對當地茶業的繁盛有一定的指示作用。休寧的太廈巡檢司原設於白際嶺附近，萬曆五年(1577)移設休寧縣城內，但很快便移駐於屯溪，僦民居而設。<sup>28</sup>據筆者對松蘿茶的研究，萬曆一朝正是

<sup>23</sup> [明]程敏政纂修，《休寧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影印，1997），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29，卷5，頁7上，頁491。

<sup>24</sup> 參見鄒怡，「松蘿山、松蘿茶與松蘿法——清中葉以前徽州名茶歷史的初步梳理」，〈明清以來徽州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頁54。

<sup>25</sup> [清]江依濂、江紹蓮撰，〈歙風俗禮教考〉，收入許承堯纂，李明回、彭超、張愛琴點校，《歙事闕譚》（合肥：黃山書社，2001），卷18，標點本，頁603。

<sup>26</sup> 許承堯纂，樓文釗、石國柱修，《歙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1937年鉛印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1，卷3，食貨志，頁131。道光八年為1828年。另外，從康熙年間頒布的徽州各縣茶引數來看，歙縣額請茶引10,518道，休寧額請茶引9,662道，歙縣引額高於休寧，但是，績溪縣「出產茶斤，向不請引，由歙引行銷」，歙縣的引額實際上包括了歙縣和績溪兩縣。參見〔清〕馬步蟾纂修，《徽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道光七年(1827)刻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48，卷5之1，食貨志賦役，頁402。

<sup>27</sup> [清]張佩芳修，劉大櫆纂，《歙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影印，1975），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32號，卷6，茶綱，頁2上，頁329。

<sup>28</sup> [清]何應松修，方崇鼎纂，《休寧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2，卷2，廨署，頁4下，註引萬曆

松蘿創製之後迅速名揚海內的第一個高峰時期。太廈巡檢司在這時移駐屯溪，清晰地表明以屯溪為中心的休寧茶業在當時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規模。關於當時屯溪的城市規模，在天啓《休寧賦役官解全書》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記載：「屯溪係一邑總市，商牙輳集，米船絡繹相繼。」<sup>29</sup>

從新安江上游的水系組織來看，屯溪正處於來自於黟縣的橫江與東西橫貫休寧縣大部的率水交匯之處，兩水共同匯為漸江，東流入歙縣境內，構成新安江上游的幹道。徽州西部的祁門和婺源兩縣，又分別與黟縣和休寧隔山而望，因而，屯溪扼守新安江上水至休寧和黟縣，以及祁門、婺源兩縣的要衝，以上四縣若從新安江下水入江南，亦須取道屯溪。除了歙縣和績溪位於休寧下游，兩縣茶產相當部份順新安江而下，由街口巡檢司查驗引票外，其餘四縣茶引多由休寧的巡檢司查驗。早在元代末年，便有休寧的榷茶使者及其屬下到黟縣境內勒索茶商的現象發生。<sup>30</sup>同治《祁門縣志》在回顧徽州茶稅歷史時提到，太廈巡檢司移駐屯溪後，「徽屬……向章新茶出山，皆歸休邑屯溪辦理，由休寧縣派承查驗給引，由太廈司勘合切角放行，其稅每引不過分釐」，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咸豐三年(1853)，徽州茶釐開徵，茶引制度自然瓦解。<sup>31</sup>在茶業及當地其他山林特產的帶動之下，至康熙年間，屯溪街已經「鎮長四里」，成為休寧縣下各市鎮中規模最大的一個，<sup>32</sup>沿岸船行如梭，帆檣林立，開始出現「屯浦歸帆」的盛景。<sup>33</sup>當時，出身吳江的學者潘耒曾遊歷徽州，自休寧腹地順水往

<sup>29</sup> 《休寧縣志》，頁 46。

<sup>29</sup> 天啓《休寧賦役官解全書》，轉引自趙本一，〈屯溪水運拾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屯溪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屯溪文史》（屯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屯溪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輯 2，頁 67。

<sup>30</sup> [元] 趙汎，〈黟令周侯政績記〉，輯入〔清〕吳恂華修，程汝翼、俞正燮纂，嘉慶《黟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6，卷 14，藝文，頁 19 上，頁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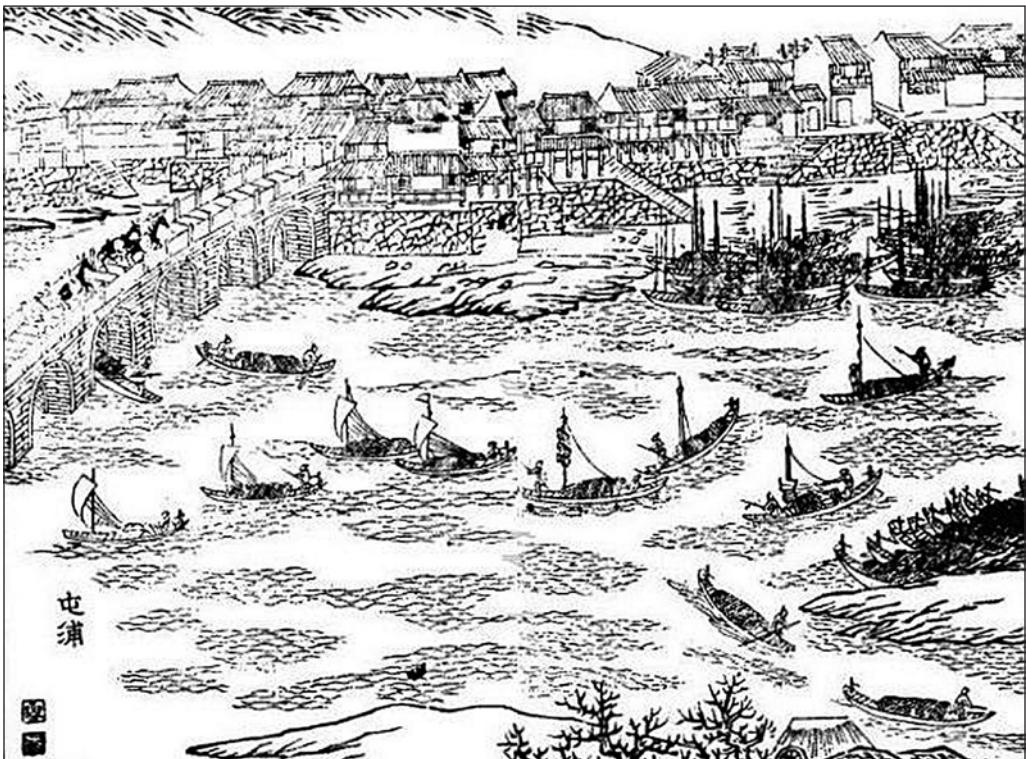
<sup>31</sup> [清] 汪韻珊纂，周溶修，《祁門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5，卷 15，食貨志，頁 6，頁 149。

<sup>32</sup> [清] 廖騰煃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影印，1970），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90 號，卷 1，方輿，頁 204。

<sup>33</sup> [清] 廖騰煃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卷 1，圖說，頁 106-107。

歙縣，途徑屯溪時，他不禁感慨「井里俄繁盛，山川更鬱蒼」。<sup>34</sup>海寧藏書家吳騫祖籍休寧厚田，乾隆三十九年(1774)，吳騫回鄉省墓，上水臨近屯溪時，正是清明當日，但見「兩岸人家益增台榭之勝。是日風色晴明，上塚者船中悉載絃管，翠幙紗窗，笙歌嘹亮，數十里往來不絕。臨水之家則有憑欄下瞰飄然欲仙者。」見此繁華盛景，吳騫驚呼：「宋人所作清明上河圖，未審視此何如耳。」<sup>35</sup>

圖 2 屯浦歸帆



圖片來源：〔清〕廖騰煃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卷1，圖說，頁106-107。

<sup>34</sup> [清]潘耒，〈水口至屯溪入休歙界〉，《遂初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刻本影印，200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417，卷 12，楚粵遊草，頁 2 下，頁 306 下。

<sup>35</sup> [清]吳騫，《愚谷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影印，200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54，卷 14，頁 2 下，頁 316 上。

從前揭同治《祁門縣志》一條記載的行文來看，似乎徽州的全部外運茶產均由屯溪的太廈巡檢司查驗引票，也就是說，連屯溪下游的歙縣茶葉也會上水至屯溪辦理勘合手續。從水道流向來看，歙縣茶逆流而上令人感到奇怪。這一反常的現象，必須置於更大的歷史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

十六世紀之後，歐洲開始進入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依靠其航海技術的優勢，佔據了與東方貿易的先頭。明嘉靖十四年(1535)，廣州市舶司移駐澳門，與來自葡萄牙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客商進行交易。徽州的茶葉很有可能在當時已經往澳門出售給海外商人，嘉慶《黟縣志》即載有：當地所產之茶，「北至口外，南至澳門」。<sup>36</sup>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1600 年從政府獲得遠東經營的特許證書後，也開始逐步擴展它在東方的貿易範圍。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首先到達今印尼境內的 Bantam、印度的 Surat、Ganjam、Madras 等地，從葡萄牙商船處間接購入中國茶葉。<sup>37</sup>此後，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逐步接近中國本土，1676 年，在廈門設立商館，購買中國茶葉；1702 年時，曾經應英國國內訂貨之需，採購了一整船茶葉，「其中配新羅茶(Singlo)三分之二、圓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sup>38</sup>Singlo 此處譯為「新羅茶」，實為誤譯，Singlo 應係「松蘿」之音譯，<sup>39</sup>因而很有可能，當時已經有徽州綠茶被客商運往廈門出洋。<sup>40</sup>1715 年之後，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通過與廣州地方官員反覆交涉，終於得到允許將商船駛入黃浦停泊，開始在廣州通商，並憑藉英國政府的特許，長期壟斷中英之間的貿易。<sup>41</sup>在鴉片輸入中國之前，茶葉是中英貿易之間絕對的大宗。那麼，

<sup>36</sup> [清] 吳旬華修，程汝翼、俞正燮纂，嘉慶《黟縣志》，卷 3，地理，頁 62 上，頁 89。

<sup>37</sup> [美] 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原著，中國茶葉研究社社員集體翻譯，《茶葉全書》（上海：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上冊，頁 38、41。

<sup>38</sup> [美] 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著，《茶葉全書》，上冊，頁 42。

<sup>39</sup> 參見〔日〕內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頁 250。

<sup>40</sup> 但是，此處 Singlo 是否一定指徽州的松蘿茶，筆者尚無絕對把握。因為，清代人吳振臣曾提到福建武夷山的茶葉在採用松蘿法之後，時有「武夷松蘿」之稱（吳振臣撰，〈閩遊偶記〉，收入《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頁 360-361）。但鑑於松蘿是明清時代徽州最有名的茶產，此處 Singlo 系徽州綠茶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

<sup>41</sup> [美] 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著，《茶葉全書》，上冊，頁 43。

徽州茶葉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貿易中能佔到多大的份額呢？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內收藏有一份 1824 年 1 月的 The Edinburgh Review, No LXXVIII，其中記錄了 1822 年東印度公司廣州貿易中各類茶葉的經銷量，其中，武夷(Bohea)2,419,045 磅、工夫(Congou)18,569,472 磅、揀焙(Campoi)196,729 磅、小種(Souchong)115,738 磅、屯溪(Twankay)4,036,445 磅、皮茶(Hyson-skin)130,420 磅、熙春(Hyson)396,697 磅，共計 25,874,546 磅。<sup>42</sup>屯溪無疑是徽州綠茶，熙春指長條且略帶捲曲的綠茶，諸多綠茶產區均有此名目。徽州的熙春也非常有名，當時洋商中有傳說，「熙春」的創製與康熙時的休寧茶商李亦馨有關，故此處熙春為徽州茶的可能性很大。<sup>43</sup>皮茶，據其英譯 Hyson-skin，應該是製作熙春茶時篩揀出來的輕薄葉片，即熙春中的皮茶，因此也可能是徽州茶。若保守估計，屯溪茶佔當年東印度公司廣州一地茶葉總經手量的 15.6%。若屯溪 / 熙春和皮茶三類合計，則佔 17.64%。

從徽州到廣州雖然路途遙遠，但是獲利豐厚，遠在廣州的利源吸引了徽州商人運茶南下。從長江中游地區到廣州，自鄱陽湖沿贛江南下，翻越大庾嶺是一條傳統的古商道。<sup>44</sup>在廣州外銷引力之下，以往習慣走新安江水路外運的徽州松蘿茶，也開始「悉由江西內地販運來粵」。<sup>45</sup>同時，從徽州到廣州，另有一條便捷的道路便是沿東南海岸線海運至廣州。嘉慶年間，台灣早已平定，「洋面平靖」，於是，商人們開始嘗試海道運茶，嘉慶十八年(1813)後尤其盛行。但兩廣總督蔣攸銛認為，如果任憑商人自由販茶出洋，一方面缺少了一個從貿易上鉗制洋人的手段，另一方面也難保商人出洋夾帶違禁物品，因此他奏請朝

<sup>42</sup> [日]田中正俊，〈「東インド会社の独占——茶の価格」（一八二二年）について〉，收入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記念論集編集委員會編，《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1981），下卷，頁 513。

<sup>43</sup> H. G. Hollingworth, “List of the Principal Tea Districts in China and Notes on the Name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Black and Green Te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pp. 12-13.

<sup>44</sup> 陸玉麒，〈論贛江流域空間結構的演化過程及其規律性〉，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輯 21，頁 115-130。

<sup>45</sup> [清]梁廷枏纂，《粵海關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粵東省城龍藏街業文堂刻本影印，1975），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183 種，卷 18，禁令二，頁 3 下，頁 1268。

廷命令福建、浙江和安徽的督撫，曉諭各大茶區商人，自嘉慶二十三年(1818)起，「仍照舊例，令由內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sup>46</sup>這一條令發出後，仍有茶商自上海江海關出洋，南下運茶。因為江海關一直允許沙船運茶北赴山東、奉天等省，商人便利用這一空子，待出洋後再轉為南下。政府覺察到這一漏洞後，不惜損失江海關的茶葉稅，嚴禁一切茶船出洋，「只准由內河行走，以裕內河各關商稅，即將江海關茶葉稅則永遠豁除，無令茶船出口」。<sup>4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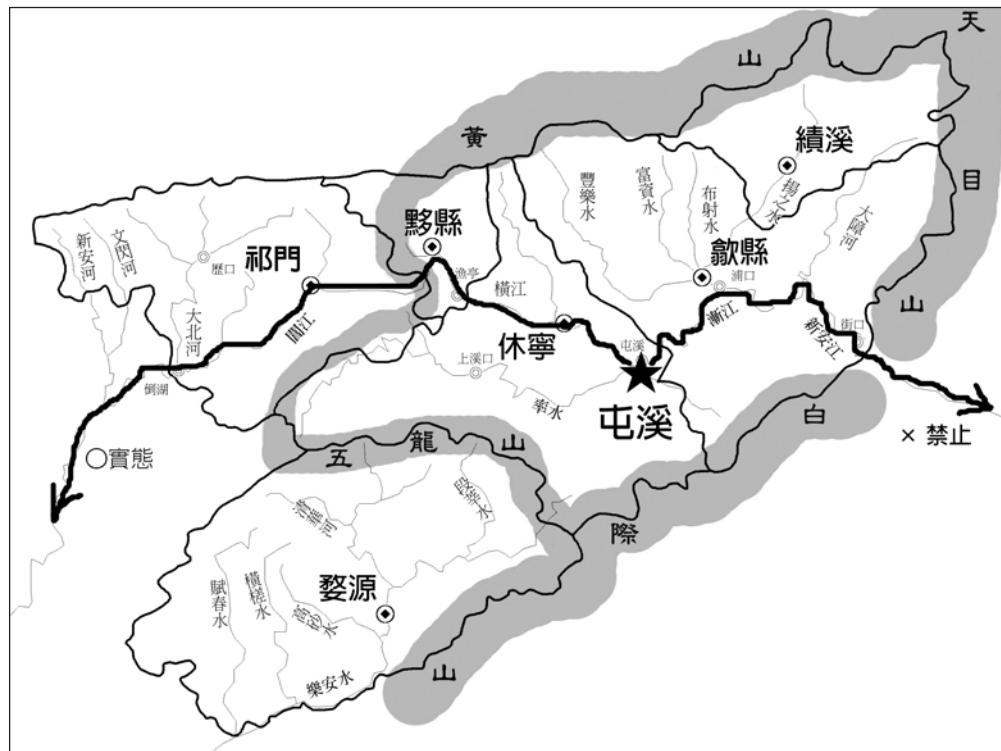
圖 3 清代徽茶南下廣州的路線



圖片說明：圖3-1，筆者繪製。

<sup>46</sup> [清] 梁廷枏纂，《粵海關志》，卷 18，禁令二，頁 3 上-4 下，頁 1267-1270。

<sup>47</sup> 〈戶部尚書英和等為遵旨會議江海關無令茶船出口事奏摺〉，道光元年(1821)二月二十五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方裕謹編選，〈道光年間茶課史料續編〉，《歷史檔案》，1998 年第 3 期，頁 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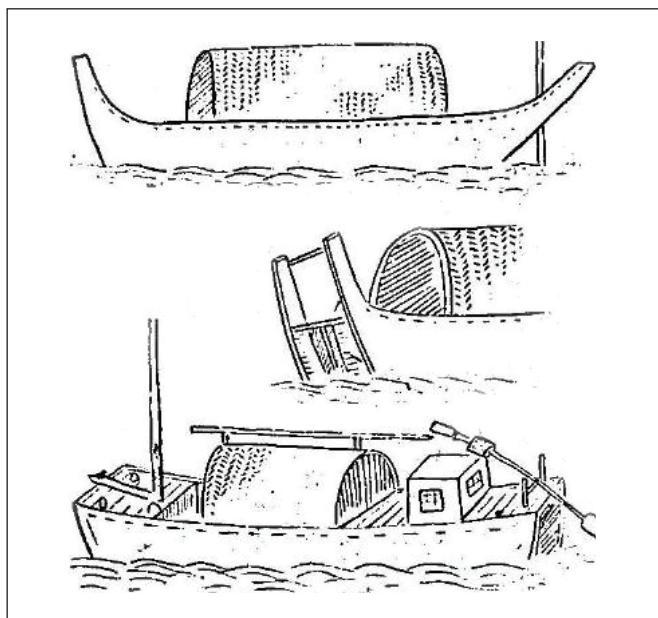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圖3-2。筆者繪製。

因此，在政府嚴加禁令之下，徽州茶葉南下廣州外銷，只有鄱陽湖——贛江——大庾嶺一條道路可以選擇。徽州西部祁門和婺源兩縣屬鄱陽湖流域，與東部新安江流域諸縣以分水嶺相隔，徽州東部進入南下商道的最便捷道路便是溯新安江而上，翻越分水嶺進入鄱陽湖流域。因而，屯溪下游歙縣的茶葉若要往廣州外銷，便會上水過境屯溪。歙縣芳坑江氏茶商留有一份〈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進廣贍清帳冊〉，記載了他們赴廣州賣茶的路線，自歙縣篁墩掛號運貨至屯溪，在屯溪僱船至黟縣漁亭，從漁亭上岸，改走旱路，開始翻越鄱陽湖流域和新安江流域之間的分水嶺，用銀元僱了三、四百人的挑夫，用肩挑背馱，經過 62 華里的山間小道，把茶箱運至祁門，再從祁門僱駁船、竹筏沿閩江運茶至饒州，僱傭了三板七倉船 3 艘、六倉船 1 艘運至贛州，正式進入贛江——大

庾嶺商道。<sup>48</sup>另一份〈萬里雲程〉抄本，可能也是芳坑江氏的路程手冊，記載了相似的運茶路線：由歙縣自新安江上水至屯溪，溯橫江而上至黟縣漁亭，翻越分水嶺入祁門，順閩江而下，過饒州進入贛江南商道，翻越大庾嶺南下廣州。<sup>49</sup>因為遠在廣州的拉力，屯溪也成為歙縣洋莊茶葉的過境要衝，與原有休寧本地茶業的影響力相互疊加，市面日趨繁榮。

圖 4 祁門船



圖片來源：〔日〕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9），卷12，安徽省，頁249。為適應祁門至上饒一段閩江水淺流急的狀況，祁門船的船底呈扁平狀，其載貨量也隨閩江枯水、豐水而變化，豐水期可載貨100擔，枯水期僅能裝載20擔（頁250）。徽州茶商過境祁門僱傭的祁門船應該就是這一種。

<sup>48</sup> 江怡桐，〈歙縣芳坑江氏茶商考略〉，收入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頁 588-589。

<sup>49</sup> 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 16-20 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 436-445；另參見王振忠，〈清代徽州與廣東的商路及商業——歙縣茶商抄本〈萬里雲程〉研究〉，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輯 17，頁 297-315。

通過上文對明後期至清末屯溪發展歷程的考察，可以看到兩個因素先後對屯溪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明後期源自休寧的松蘿茶帶動了休寧茶業的興盛，屯溪以其水路中樞地位，成為休寧縣茶產沿新安江進入國內市場的彙集之地，政府對茶葉引票實行管理的巡檢司也移駐屯溪，要求商人運茶出境前就而勘合。位於屯溪下游的歙縣茶產在內銷時代一般並不過境屯溪，但是十八世紀之後，廣州外銷興起，在政府對南下路線嚴加限定的條件之下，遠自廣州的拉力吸引了歙縣外銷茶也開始過境屯溪，進一步促進了屯溪的發展。自然與制度的交織力量，帶動了屯溪茶業的早期發展。

### 三、周邊產業的集聚

上海開埠之後，徽州新安江流域的洋莊茶漸漸過渡為就近往上海出口，至少歙縣的茶葉無需溯水過境屯溪。徽州鄱陽湖流域的茶產在太平天國戰爭阻隔了南下商路之後，也開始結束其往廣州出口的歷史，取道九江轉向上海售與洋商。同時，太平天國期間，徽茶一律抽收過境釐金，茶引制度隨之消亡，前往屯溪截角勘驗成為了歷史。這些因素都會對屯溪的茶業中心地位產生一定的削弱作用。

但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屯溪社會經濟的日趨繁榮，清道光時，杭州人夏之盛在遊歷徽州後，便感歎「屯溪隆阜間，民生素殷沃」，<sup>50</sup>至光緒年間，屯溪已經「為休邑之冠，各行業既備且多，四方窮民來覓食者踵相接」。<sup>51</sup>這需要從地方經濟民生的變化中尋找答案。太平天國戰爭在徽州地區反復拉鋸，據推測人口損失在 60% 左右。<sup>52</sup>地方民生緩慢變化的長期累積，以戰後重建為契機，表現於新的地方經濟格局中，這也在當時地方時尚的流變中透露出一些

<sup>50</sup> [清] 夏之盛，〈四月十六日挈眷之新安壬寅〉，《留餘堂詩鈔二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錢塘夏氏刻本），新安紀行草，頁 1 上。

<sup>51</sup> 《新安屯溪公濟局徵信錄》（婺源：婺源縣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七年(1901)刻本），稟呈，頁 3 上。

<sup>52</sup>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卷 5，清時期，頁 500。

端倪。戰爭以前，徽商資本最為雄厚的產業為鹽業，從業者又以歙縣人居多，歙縣鹽商雲集的揚州，時有詩云：「鹾客連檣擁鉅資，朱門河下鎖葳蕤。鄉音歙語兼秦語，不問人名但問旗。」<sup>53</sup>因此，同期的徽州本土，歙縣「通邑以西鄉為最華，當年鹾業大盛，揚州靡俗逐漸輸入」。<sup>54</sup>但太平天國前夜道光年間陶澍的鹽政改革，打破了徽州商人在鹽業的壟斷，鹽商走向衰微。日漸失卻流寓地商人外來滋潤的徽州，地方物產的運銷日趨重要，屯溪作為徽州土產的集散中心，其地位也日益提高，成為當地時尚的新前沿。據時人記載，「自髮逆亂平，徽屬商務聚於屯溪。一冠履之時趨，一袍袴之新樣，其自江浙來者，休首承之，次即及歙之西鄉。近少婦好效滬妝，年長者猶帶鬏（揚州舊制），此今昔習染之大驗也。」<sup>55</sup>屯溪代替歙縣西鄉成為徽州的時尚之都。

雲集屯溪的各類土產中，以茶葉最為重要。內銷時代，屯溪即作為休寧、黟縣兩地茶產沿新安江外運的集中節點，至廣州外銷時代，屯溪除繼續保持作為休寧縣茶業中心的地位外，又疊加了屯溪下游歙縣等地洋莊茶進入江西——廣州商路的過境節點地位。在這兩個階段先後延續的 200 年左右時間裡，與茶業相關的周邊產業逐漸在屯溪聚集。清末宣統年間，直隸靜海人劉汝驥主政徽州時，<sup>56</sup>曾進行過一次全府的民情調查，據訪察，休寧縣內的「職業趨重之點」，「屯溪、率口、黎陽、陽湖一市，茶之區也。朱明節屆，男婦壯幼業此者數以萬計，茶號藉錢莊以資助之。……工匠缺乏，又召江西人以伐木燒炭矣。」<sup>57</sup>

<sup>53</sup> 《揚州竹枝詞》，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166。

<sup>54</sup> [清] 劉汝驥撰，《陶甓公牘》，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彙編，《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據清宣統三年(1911)安徽印刷局排印本影印，1997），冊 10，卷 12，法制科，頁 7 下，頁 581。

<sup>55</sup> [清] 劉汝驥撰，《陶甓公牘》，收入《官箴書集成》，冊 10，卷 12，法制科，頁 7 下，頁 581。

<sup>56</sup> 劉汝驥的傳記，另可參見周駿富輯錄，《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台北：明文書局，1985）冊 16，頁 526。

<sup>57</sup> [清] 劉汝驥撰，《陶甓公牘》，收入《官箴書集成》，冊 10，卷 12，法制科，頁 17 上，頁 586。「朱明節」即清明節。率口、黎陽和陽湖都是屯溪城區周邊緊鄰的自然村鎮，在屯溪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屯溪城區吸納，到抗日戰爭時期，這幾個村鎮，以及周邊的高陽、隆新，已經共同構成了今日屯溪市的雛形。參見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省屯溪市地名錄》（內部資料，屯溪：編者印行，1985），頁 1。

此時的屯溪，業已成爲「茶務都會」，<sup>58</sup>時人有詩云：「皖南巨鎮首屯溪，萬戶居民本富庶。商賈輻輳闐闐盛，茶客年年競來去。」<sup>59</sup>

徽州茶葉的加工過程中，洋莊、本莊綠茶和紅茶均需經過初製和精製兩大工序，初製由茶農自行完成，精製由茶號完成。初製的工具較爲簡單，且竹籃、灶頭等不必專門置辦，均爲一般農事的常用工具。精製茶號所需工具則複雜得多，其中焙籠、茶篩、風車等均須專門置辦，但相對而言，這些工具使用壽命比較長，一次投資，可以使用多年。<sup>60</sup>但是，在茶葉精製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大量的易耗品。在茶葉包裝時，錫罐、木箱和篾簍等都是隨用隨耗，每年茶季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其次，農村資本枯竭，單靠農村集資無法湊出茶號正常運營所需的足夠資本，因而需要從通商口岸城市獲得貸款，於是，金融服務也是每年茶季所必須的。

茶葉精製中的易耗品和所需的流動資本，需要固定而方便的周邊產業給予及時的補充。屯溪在前述內銷和廣州外銷階段，便開始了此類周邊產業的逐步積累。進入上海外銷時代後，雖然歙縣的茶葉更容易偏向於直接順新安江而下，無需過境屯溪，但是休寧的茶葉始終保持高產，故屯溪作爲休寧茶業中心的最基本地位沒有任何動搖，歷經兩百年左右的發展，屯溪形成了完備的茶業周邊產業群。

洋莊綠茶製成勻堆後，首先需要裝入鉛罐。所謂鉛罐，實際爲鉛、錫合金製成，故茶業中稱鉛罐者有之，稱錫罐者亦有之。鉛罐製作需要專門的熔爐，因而茶號無法自製，必須直接使用外來的製成品，屯溪街頭的鉛罐作坊便應運而生，民間習稱爲「錫棧」。據 1930 年代中期的多份調查，當時屯溪共有錫棧 4 家。

<sup>58</sup> 趙爾巽、柯劭忞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標點本，冊 8，卷 59，志三十四地理六，頁 2010。

<sup>59</sup> [清]戴啓文，〈抵屯溪〉，《新安遊草》（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一年(1895)徽州屯溪下街黃茹古堂刻本），卷上，頁 8 上。

<sup>60</sup> 比如祁門茶號所使用的茶號有兩大類，河口篩和婺源篩，婺源篩經久耐用，可以使用八、九年，河口篩品質較差，但也可以使用二、三年。紅、綠茶篩分所用茶篩實際爲同一種。參見《祁門之茶業》，收入《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叢刊第一種》（上海：中國紡織印務有限公司，1933），頁 11。

表 1 1930 年代中期屯溪的錫棧

牌名	經理姓名	幫別	地址	資本額(元)	熔爐數	雇工人數				估計產量(只)			
						1933	1934	1935	1936	1933	1934	1935	1936
成泰	江星郎	黟縣	後街	2,000	4	30	22	26	28	25,000	10,000	14,000	16,000
和豐	胡次培	黟縣	後街	2,500	2	20	12	12	12	20,000	16,000	6,000	10,000
道源	余福來	黟縣	觀音山	5,000	4	30	24	24	24	30,000	16,500	16,600	14,000
公和	吳品三	黟縣	觀音山	3,000	4	30	20	20	20	27,000	15,000	15,000	17,000

資料來源：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24；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據南京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1935年8月出版之版本影印，1971），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9種，冊2，頁43；實業部國產檢驗委員會、上海商品檢驗局合編，《屯溪茶業調查》（上海，1937），頁15。三份材料之記載有若干不同，擇其相對合理者入上表。

表 1 所列 4 家錫棧皆為經營多年的老店，其中，和豐錫棧經營此業最久，開業於十九世紀中期。錫棧中茶罐的製作分為熔錫、鑄片、剪形、過秤、焊接和糊紙六個步驟。鉛錫原料為錠狀，長條形或圓錐形，要鑄成茶罐薄壁，首先需入爐熔化，這一工作一般由錫棧中的學徒工完成，每日清晨 2 時許開爐，經過 1 小時左右，全爐四五百斤錫業已熔化，為白天的製罐工作做好準備。鑄片需要高明的技術，錫棧技師將已熔化之錫，勻取少許，倒入木製糊有凋樣紙的模具中，凋樣紙用表芯紙做成，每個木模具內糊有凋樣紙 12 層，倒入錫汁後，壓實後連紙揭起便成錫片，1 副木模能鑄片 100 張左右。剛鑄成的錫片，四緣並不規則，此時便需根據錫罐大小，襯上硬紙板製成的大樣，用剪刀將錫片修剪均勻，此為剪形。一個錫罐由 19 塊錫片拼成，為控制成本，完成一套錫片後，錫棧會稱量一套錫片的重量，若份量過重，有虧錫棧血本，老闆寧可將這些錫片回爐重鑄。重量符合規定的一套 19 塊錫片，由 2 人分工焊接成茶罐，一人圍成罐身，另一人焊接茶罐的底和面。由於錫棧對錫片用料成本控制甚嚴，

罐身多孔鏽，不僅有礙觀瞻，茶葉亦會洩漏，故錫棧會在錫罐外加糊紙張，一般先糊表芯紙一張，再以綿紙糊其上，考究一點的錫棧會在中間再加一層牛皮紙，糊紙乾透後，即為茶罐成品。錫罐最後的封口，一般由錫棧工人前往茶號完成。

圖 5 錫罐的製作



圖片來源：《農村合作》，卷2期3（1936年10月），插頁。

從以上工序中可以看到，錫棧最主要的原料是鉛錫錠，這類金屬多出產於東南亞，五口通商之後，徽州所用鉛錫錠由上海和寧波進口而來，<sup>61</sup>1896年9月後，杭州海關開通，寧波的地位被杭州取代。不過，徽州從寧波和杭州輸入的鉛，絕大部份也是從上海轉口而來。<sup>62</sup>襯模和糊罐用的表芯紙多由江西和夥

<sup>61</sup> 杭州開埠之前，寧波浙海關進口的鉛大部份運往徽州製作茶葉罐。可參見 1870-1896 年寧波浙海關歷年貿易報告，「進口之鉛大部運往徽州製作茶罐」，這幾乎是每年浙海關稅務司都會提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sup>62</sup> 可參見李必樟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 1854-1898 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頁 158。民國中期以後，各口岸之間錫錠塊的轉口情況，可參見鄭友揆、韓啓桐編纂，《中國埠際貿易統計 1936-1940》（北京：

縣等地運來，綿紙則從歙縣運來。茶葉在裝入錫罐後，需外套木茶箱，故錫罐的形狀也要與木箱配套，分大方、三七和放方三種。除錫棧自辦原料，出售成品給茶號外，也有茶號自行將原料配齊，委託錫棧加工，以降低成本。屯溪的錫棧不僅供應本地茶號以茶罐，歙縣漁梁、深渡等地洋莊茶號亦向屯溪錫棧採辦茶罐。<sup>63</sup>

從表 1 來看，全屯溪僅這 4 家製作茶罐的錫棧，因而營業穩定。除工資外，錫棧工人膳宿全包，不論當天是否輪到工作，每日配有肉食 4 兩，陰曆的初一和月半肉食加倍。工作時，以 6 人為一班，每工作 4 日，休息 1 日，工作時間自午夜 2 時熔錫開始，至當天製成錫罐 60 只為止，其時一般也不過中午 12 時左右而已。穩定的營業得益於 4 家錫棧的公同議定，錫罐的用料份量和價格均預先協商確定。工人也有類似工會之組織，議定每班每日製罐數量不能超過 60 只，否則便有驅逐出會之懲罰，如工期較緊，亦不許同一班頭連續加班，必須更換另一班繼續工作，以便利益均霑。

屯溪的錫棧業能在業主和工人兩個層面達成利益共用的同業聯盟，離不開這一行業的地緣背景，從表 1 看，4 家錫棧全為黟縣人所開，同鄉、同業雙重關係，強有力地維持了從業者對本行業的壟斷和利益的均分，「萬不容第二者插足」。屯溪曾有茶號認為黟人錫棧製作的錫罐牢度不夠，自行仿製堅固的錫蘭洋鐵皮茶箱，以防止罐破茶漏，影響外銷。這本是一件有利於茶業的好事，但錫棧唯恐此類茶箱一流行，本業勢必破產，於是全體罷工相要脅，逼迫謀求改良之茶號將置辦的洋鐵皮茶箱全部退還上海。<sup>64</sup>屯溪黟縣幫錫棧的勢力之大，可見一斑。<sup>65</sup>屯溪是黟縣取道新安江，前往蘇滬杭的第一站，在屯溪傭工

63 中國科學院，1951），收入《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叢刊》，第 1 種，頁 640-647。

64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歙縣》（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據南京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 1935 年 8 月出版之版本影印，1971），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 9 種，冊 2，頁 60；《屯溪茶業調查》，頁 14。

65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據南京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 1935 年 8 月出版之版本影印，1971），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 9 種，冊 2，頁 44。

66 舒斯笏、程壽保纂，許複、吳克俊修，民國《黟縣四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 1923 年黟

經商的黟縣人不少，自流寓地返回家鄉的黟縣人也多在屯溪停留。1919 年，由旅居上海和屯溪的黟縣籍紳商牽頭，旅屯黟人集資在屯溪的珠塘鋪創建了思安堂。思安堂的建設以上海的徽寧思恭堂為藍本，主要負責起停自外地運屯的客死黟人棺柩，並闢有義塚，殮埋外運而來和客死屯溪的無主黟人材柩。<sup>66</sup>思安堂董事會中專門有「屯埠錫業董事」3 人，胡雲卿、吳品三和余鏡如，分別代表了和豐、道源和公和 3 家錫棧。<sup>67</sup>1918 年思安堂籌建集資時，和順錫棧、成泰棧、道源棧和公和棧各捐洋 10 元，和豐棧捐洋 5 元。<sup>68</sup>思安堂建成後不久，寓居屯溪的黟縣紳商於 1920 年成立旅屯古黟同鄉會，錫棧業的胡雲卿和吳品三被選為特別會董，<sup>69</sup>成泰、公和、和豐、和順、道源 5 家錫棧均樂輸會費。<sup>70</sup>從中可見錫棧從業者對於同鄉聯誼之重視，錫棧能在議價和反對競爭等方面輕易達成共謀，實現集體行動，這一層共同的鄉土基礎絕不可忽視。<sup>71</sup>1930 年代的調查中談到 4 家錫棧為多年老號，對照 1918-1920 年間黟縣同鄉團體的紀錄，所言不虛。

裝入茶葉的錫罐外面需要套上木製的茶箱，從事木箱製造的作坊稱為箱棧。屯溪的箱棧遠較錫棧為多，據民國時期的調查，全鎮共有箱棧 23 家（表 2）。

縣藜照堂刻本影印，199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8，也有相關記載，卷 7，頁 91，人物志尚義類中「趙有貴」一條：「趙有貴，字鈺堂，屏山人，幼孤貧，隨母貢春糊口，稍長習商，旋赴屯溪，學錫罐業。錫罐者，儲茶之器。徽茶為歐美所貴重，而屯溪又徽茶聚匯之地，故錫罐業頗盛。有貴銖積寸累，遂開專號，家稱小康。宗祠年久傾坍，獨立修葺，其他公益，不吝貲財，人以是多之。」

<sup>66</sup> 〈休寧縣公署佈告〉，《新安思安堂徵信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屯溪刻本，1920 年第一刻），告示，頁 2 上-3 下。

<sup>67</sup> 《新安思安堂徵信錄》，董事，頁 5 下。

<sup>68</sup> 《新安思安堂徵信錄》，特別捐，頁 13 下-14 上。除上文提到的 1930 年代中期的 4 家錫棧外，又多了一家和順錫棧，也是黟縣人經營。頁 13 下，另有「裕元棧」，也有可能是錫棧，但不能確定，因為同一捐款名單中，除錫棧外，另有布棧和紙棧，均有可能簡稱為棧。

<sup>69</sup> 《旅屯古黟同鄉會徵信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屯溪刻本，1920 年第一刻），會長會董，頁 1 上。不過，「吳品三」書中作「吳品山」，可能為手民誤植，或為別名亦未知。

<sup>70</sup> 《旅屯古黟同鄉會徵信錄》，樂輸，頁 1 下-2 上。

<sup>71</sup> 劉石吉對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的研究，也表明了地緣對同業集體行動的促成作用。參見劉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近代中國城市手藝工人集體行動之分析〉，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上冊，頁 411-429。

表 2 1930 年代中期屯溪的箱棧

棧名	經理姓名	地址	幫別	資本額 (元)	雇工人數			銷售數量(只)				
					1934	1935	1936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永聚	張階源	下街	江西	500	9	10	11	5,600	5,000	8,800	10,200	13,800
源盛	鄒寶生	下街	江西	350	6	6	6	4,800	4,000	6,000	4,500	5,000
恒發	甘守中	下街	江西	300	9	10	11	4,000	3,000	7,200	8,000	9,000
長成	傅生源	下街	江西	400	5	4	4	5,300	4,300	4,800	2,800	4,200
裕隆	甘煥章	下街	江西	350	5	6	6	4,500	3,000	6,100	5,400	7,000
義豐	黃鴻喜	下街	江西	300	5	5	5	4,000	2,800	5,800	5,000	5,900
立順	不明	黎陽	不明	350	不明	不明	不明	4,600	3,900	不明	不明	不明
源聚	不明	黎陽	不明	500	不明	不明	不明	5,200	5,000	不明	不明	不明
德豐	祝守真	黎陽	江西	350	6	5	6	4,400	3,100	3,300	3,400	5,600
同興	不明	黎陽	不明	350	不明	不明	不明	4,500	3,100	不明	不明	不明
同福	吳俊德	陽湖	江西	500	7	7	7	不明	6,000	5,010	不明	不明
同福興	周清波	柏樹	江西	400	7	7	8	5,000	4,000	4,000	3,300	4,000
永隆	張議齋	柏樹	江西	350	5	5	4	4,500	3,500	6,700	2,130	2,600
美聚	王星輝	柏樹	江西	300	2	2	不明	4,000	3,000	2,800	2,850	3,500
洪義	蘇德源	長干塝	江西	350	9	不明	不明	5,600	4,600	8,300	不明	不明
志成	章文良	羅漢松	江西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1,600	不明
恒記	吳義生	長干塝	江西	不明	不明	8	7	不明	不明	不明	3,400	4,900
億隆	鄒園發	下街	江西	不明	不明	4	5	不明	不明	不明	1,800	1,100
同豐	余守周	陽湖	江西	不明	不明	不明	7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鄒源泰	鄒友生	長干塝	江西	不明	不明	不明	3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2,400
志成昌	章文良	柏樹	江西	不明	不明	不明	4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3,000
裕順	章南生	下街	江西	350	不明	不明	不明	5,000	4,100	不明	不明	不明
聚盛	魏寶生	下街	江西	300	不明	不明	不明	4,000	3,000	不明	不明	不明

資料來源：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23-24；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44-45；《屯溪茶業調查》，頁12-13。三份材料之記載有若干不同，擇其相對合理者入上表。

對照錫棧和箱棧的資本額，便不難理解為何箱棧的數量遠多於錫棧——小額資本就足夠開設箱棧。箱棧所需板料多來自漁亭、五城、汊口和滄溪等地，運來時板料已經製成箱用大小，箱棧只需將其拼釘成箱，略加綿紙、油漆之類即成。據表 2，除個別箱棧業主籍貫不明外，大部來自江西。他們在屯溪僱傭的工人，除極少數本地人外，絕大多數來自江西撫州之臨川、豐城二縣。其中一小部份常年在山中負責原木採伐，其餘大部每年陰曆二月由家鄉來到屯溪，到陰曆七月間茶季結束，完工返鄉。總計約有半年時間在屯溪，另外半年在家鄉從事耕耘或其他工作。在箱棧內工作的工人分為木匠和漆匠兩類，木匠的工作是將箱板裝釘成箱，稱為「抖箱」或「拼箱」，漆匠負責釘箱、糙箱和油箱三道工序，糙箱係對箱板的打磨，便於上漆。箱棧除給工人工資外，還供給膳食。一批茶箱完工時，還另給額外酬勞，稱為「圓工」，木匠得 2 元，而漆匠可得 5 元。箱棧所製茶箱不能完全封口，俟茶號打官堆時，會請箱棧將茶箱送至茶號，放入裝茶錫罐後，當場封箱。因此，勻堆裝箱時箱棧工人又可以從茶號處獲得釘箱封口的工錢，稱為「酒資」，一般木匠得  $7/10$ ，漆匠得  $3/10$ ，兩類工人所得酒資的多少正好與箱棧所給圓工錢相反，估計不同工序中兩類工匠的出力多少有別。但從箱棧挑運茶箱至茶號的送箱費，仍由箱棧另外計件支付給工人。

勻堆裝箱時，另有茶號支付箱棧工人工資，尚可理解。但箱棧已經支付給工人工資，卻還要在挑箱時另外計件支付，於經營管理角度言之，不免顯得繁瑣。這樣的工資體系，實際上與江西籍箱棧的同鄉組織有關。箱棧的工作雖然簡單，但業中仍習慣學徒須三年方能滿師，三年中的工資，必須全部充為屯溪江西會館的入會費。幸而箱棧食宿全包，故學徒生活尚屬無虞，但現金收入，就得全靠挑運茶箱往茶號時所得的挑箱費和茶號支付的封箱酒資了。三年學徒期滿後，便成為正式的「箱司務」，又稱「箱師」，除工資提高外，抖箱、送箱和封箱的收入均可自行支配。

與錫棧業一樣，屯溪的箱棧出品不僅供應本地茶號，也向外輸出。歙縣的

漁梁、深渡等地也從事洋莊綠茶的製造，但產量遠不及屯溪，這兩處茶號所用茶箱，「其板料統由屯溪茶箱作製就，只需裝釘糊色即可裝用」。<sup>72</sup>這種茶箱由茶號預先向箱棧訂購，不上油漆，稱為「白坯箱」。

洋莊綠茶有多種花色，常以茶箱外不同的千金藤打法作為區別，<sup>73</sup>當然，千金藤與茶箱之間襯放的篾簍對茶箱也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屯溪的篾簍業因此應運而生。

篾簍作所用的原料是竹子，產於屯溪附近鄉村，順水放竹排而來，此外，還有箬皮，也來自附近村莊。篾簍作產品成本不高，全係手藝，因而作坊大小均有，分別被稱為「大老闆」和「小老闆」。大老闆因其資本較大，直接與茶號聯繫，確定大宗訂單。小老闆則屬小作坊性質，規模僅一、二人，或係兄弟，或係父子，或係師徒，變成篾簍後，批售與大老闆，由大老闆轉售與茶號。大老闆在本作坊出貨供不應求時，往往向小老闆收購以敷應用。篾簍作內工人工資計件給付，食宿全包，每月可食肉 8 次，每次 4 兩。茶號勻堆裝箱時，篾簍作工人亦前往茶號打包，工資另給。

在 1936 年的調查中，列出了屯溪 12 家篾簍作的情況。從表 3 來看，開設篾簍作的至少有 1/3 是江西人。<sup>74</sup>其餘的來自徽州和浙西的一些縣份，籍貫成分較錫棧和箱棧凌亂，筆者推測這與篾簍作所需資本短小，原料購置方便的因素有關。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同業或同鄉制約力，篾簍作在茶季時會擴編一些人手，據《中國經濟志·休寧縣》調查，全屯溪共有篾簍作十餘家，「依此為生之工人，總達二百餘人，茶市過後，均返原籍工作，或改營他業」。<sup>75</sup>留守屯溪的篾簍作，在茶季過後，便成為編製日常用具的竹器店。

<sup>72</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歙縣》，頁 61。

<sup>73</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32。

<sup>74</sup> 1934 年 9 月-1947 年 8 月，徽州六縣之一的婺源劃歸江西省管轄，參見唐立宗，〈省區改劃與省籍情結——1934 至 1945 年婺源改隸事件的個案分析〉，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5），頁 519-546。若將表 3 中的婺源列入江西，則至少有 1/2 的篾簍作為江西人所開設。

<sup>75</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46。

表 3 1930 年代中期屯溪的篾簍作

號名	號主姓名	地址	籍貫	雇工人數			產品數量(只)		
				1934	1935	1936	1934	1935	1936
同德順	周汝金	長干塝	遂安	15	15	15	9,400	7,000	9,200
順泰	江柏壽	長干塝	婺源	3	3	4	1,500	1,500	2,500
汪生泰	汪學達	長干塝	歙縣	6	6	6	3,000	2,400	4,300
洪德昌	洪德昌	長干塝	不明	不明	不明	8	不明	不明	5,800
柏義隆	柏蔭成	長干塝	休寧	8	8	7	5,000	3,000	4,000
汪炤林	汪炤林	長干塝	婺源	2	2	2	210	2,00	3,00
程怡順	程桂祥	長干塝	浮梁			5			2,400
楊源和	楊其麟	栗樹園	玉山	6	6	5	3,900	3,500	4,800
馬永茂	馬慶林	樂善里	樂平	4	5	4	2,400	4,700	4,700
汪永生	不明	黎陽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余永生	余永生	後街	都昌	10	10	10			6,200
隆盛	不明	後街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資料來源：《屯溪茶業調查》，頁16。

屯溪的洋莊茶號，多為合股而成，但是，本地集資所得尚不能應付毛茶收購和箱茶精製的龐大開支，需要金融機構協助吸引更多的外來資本投入。屯溪洋莊茶號林立，金融市場就此而形成。清末至民國，屯溪的金融業為三家錢莊所操控（表 4）。

屯溪錢莊的營業全在茶市，平時其他商號鮮有與其往來者。徽州洋莊茶外銷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和杭州，屯溪錢莊的通匯地也集中於滬、杭兩地，匯水、利息等惟滬市馬首是瞻。允達錢莊的主人洪朗霄為青陽人，本身即兼營茶業，在屯溪開有專門收購外來毛茶的茶行兩家——洪永泰和洪憶泰，分別設於中街和河街，是當時屯溪營業量最大的兩家茶行，經售的毛茶量分別是排名第三的

程廣昌茶號的 3 倍和 4 倍，<sup>76</sup>此外，洪朗霄名下還有牌號為「永達祥」的洋莊茶號一家，規模也不小。<sup>77</sup>大康錢莊在 1933 年歇業，這與 1931 年中國銀行支行入駐屯溪有關。屯溪中行的資本依託總行巨額，行內周轉遠較錢莊同業周轉靈便。其業務與原有錢莊重疊，同樣以茶市匯兌為主要業務，儲蓄則未經營，由此亦可見當地民間資本之短小。而中國銀行對屯溪錢莊最大的衝擊還在於匯兌的手續費問題，茶季期間的匯兌，經由中行外地匯入屯溪，匯水約 5-6 元，自屯溪匯出，則免收匯水，而錢莊的匯水較中行高數倍，在銀行競爭的壓力之下，錢莊不得不自行抑減，大康錢莊首先在競爭中失敗歇業。<sup>78</sup>此後，中國農民銀行、安徽地方銀行等相繼入駐屯溪，為屯溪茶業吸納外來資本提供了不少手續上的便利。<sup>79</sup>

表 4 1930 年代中期屯溪的錢莊

牌號	地址	創立時間	錢莊主	組合性質	資本額 (元)	營業額(元)		
						1931	1932	1933
允達	梧岡巷	宣統元年 (1909)	洪朗霄	合資	50,000	800,000	700,000	600,000
致祥	中街	光緒 22 年 (1986)	孫烈五 吳蝶卿	獨資	50,000	850,000	740,000	700,000
大康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資料來源：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62。

<sup>76</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28；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 6。

<sup>77</sup> 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 65。

<sup>78</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61-62；

<sup>79</sup> 1936 年 4 月 6 日，中國農民銀行在屯溪設立辦事處，同年 5 月，安徽地方銀行在屯溪設立分行，參見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鑑 1937 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民國 26 年(1937)版本影印，1987），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239 種，上冊，頁 27、28、102。

以上，筆者詳細研究了與屯溪洋莊茶業密切相關的四大周邊產業：錫棧業、箱棧業、篾簍業和金融業。錫棧、箱棧和篾簍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錫棧為黟縣人把持，箱棧業多為江西人所從事，篾簍業兼有皖浙贛籍業主。這批外來務工人員，一部份僅在茶季半年中來屯溪做工，另半年返回家鄉務農，另有相當部份就此定居屯溪，開始了固定恆久的生計。黟縣和江西都在屯溪成立了各自的同鄉組織，前者應勢新生，後者強制同鄉學徒入會，均反映了同鄉之間關係的緊密，而同鄉組織也正是一個外來人口激增的城市中，短暫流寓與定居土著化之間一種中間狀態的表徵。<sup>80</sup>同鄉組織的發達，表明這一城市外來人口的增長，暗示這一城市正經歷著成長壯大期，清末民國的屯溪正處於這一階段。

從各產業出品的銷路看，錫罐、茶箱不僅供應屯溪茶號，也供應下游歙縣的洋莊綠茶精製中心深渡和漁梁。金融方面的服務，各大銀行首先將分行或辦事處設於屯溪，統攝整個徽州，乃至皖南地區。

仔細揆究錫棧、箱棧和篾簍作的製造工序，還可以發現一個細節，錫罐、茶箱的最後封口，篾簍的最後打包都需要派工人前往茶號完成。周邊產業是為茶業服務而產生，但這樣的工作安排，又反過來形成了一種促進主產業集聚的拉力，吸引茶號集中於屯溪，以便得到密集周邊產業的周到服務。有一現象值得特別注意：除與休寧臨近的黟縣外，屯溪下游的歙縣、績溪，乃至浙江的淳安、遂安等地毛茶也溯新安江而上，入屯溪洋莊茶號精製，<sup>81</sup>這正是周邊產業促成主產業集聚的一個明證。

<sup>80</sup> Clifford Geertz 通過對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將同鄉組織視為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一種「過渡型組織」(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並認為同鄉組織是資本主義文化世界的產物。參見 Clifford Geertz,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0:3 (April 1962), p. 260。其後，Hamilton 比較了中國和西非的同鄉組織，發現中國的同鄉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便已經出現，據此，他認為與其說同鄉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不如說是城市商業和製造業發展的產物。Hamilton 認為同鄉組織的存在有三個要件：1. 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集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彙集；2. 這批入城勞動力依然大量保留了與鄉村的社會關係；3. 且多為短期移居。參見 Gary G. Hamilton, "Reg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3 (July 1979), pp. 346-361。

<sup>81</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27。

## 四、生活服務產業的跟進

屯溪成為茶務都會後，每年茶市便有大量務工人員湧入。洋莊茶號中，有來自安慶六邑的焙工、篩工，來自婺源、歙縣的茶師，還有從附近鄉村趕來的揀茶女工。周邊產業中，錫棧的黟縣人，箱棧的江西人等等。同時，還有前來採購的茶葉客商，包括來自通商口岸的洋莊商人與華北和江南的本莊商人。明末清初的屯溪，「轄八百戶」，<sup>82</sup>至 1919 年前後，僅常住人口便增至約 15,000，戶數 3,000 上下。<sup>83</sup>當時，徽州府城徽城鎮的人口僅 9,000 左右，<sup>84</sup>徽州地區其他縣份的縣城人口則更少，例如，休寧縣城人口約有 3,000，戶數為 500 左右，<sup>85</sup>祁門縣城的人口約有 2,000，戶數在 400 上下，<sup>86</sup>黟縣縣城約有 5,000 人，<sup>87</sup>績溪縣城規模較小，人口僅 1,000 上下。<sup>88</sup>顯然，在當時徽州地區各城市中，屯溪居於翹楚之位。明清四大鎮之一的江西景德鎮，位於徽州左近，同期城市人口也僅 20,000 左右，戶數在 3,000 上下。<sup>89</sup>以上各城市的人口數字均採自《支那省別全誌》，該書對城市人口的估計常有偏低的傾向，<sup>90</sup>但以相同出處史料的橫向比較來推斷屯溪在各城市中的相對地位，應當不致有大的偏差。

人流會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除茶葉外，徽州及其鄰近的皖南、贛東一些縣份的特產也逐漸彙集於屯溪。桐油、木材、柏油、生漆、蜜棗、香菇、硯台、墨品、雪梨、藥材、炮竹以及景德鎮的瓷器等都在屯溪集散。<sup>91</sup>不同的農產和

<sup>82</sup> 《休寧縣風土志》，轉引自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 36。

<sup>83</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9），卷 12，安徽省，頁 73。

<sup>84</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頁 67。日人在調查時發現，在當地人的一般印象中，徽城鎮號稱人口有 20,000，戶數 7,000。但日人在實地調查後，認為城內實際人口僅 9,000 上下。筆者認為，當地人一般印象與實地調查資料間的差別，也正暗示了徽城鎮此期地位的下降。

<sup>85</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頁 70。

<sup>86</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頁 77。

<sup>87</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頁 80。

<sup>88</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頁 81。

<sup>89</sup>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卷 11，江西省，頁 82。

<sup>90</sup>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 5，清時期，頁 810。

<sup>91</sup> 可參見財政部直接稅處屯溪分處，〈皖南特產調查〉，《直接稅月報》，卷 1 期 12（1941 年

山貨各有上市季節，時間相錯相重，構成了屯溪持續的輸出貨物流。交易的要義在於交換、互通有無，屯溪的土產輸出帶動了其他貨物的流入，「聞其每年輸入貨值總額可達八百餘萬元，而輸出額亦得七百餘萬元。」「輸入以油鹽南貨等項為最巨，聞每年進口鹽之總值，計達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油與南貨二項共值一百二、三十萬元，此外紙煙消耗，亦佔百萬元，殊足驚人。……布匹、洋貨及南廣貨等輸入亦可觀，前者年達九十萬元左右，後者約四十萬元，餘若煤油、錫箔等項，各僅二、三十萬。」<sup>92</sup>繁忙的貨物進出催生發達的運輸，屯溪橋一帶帆檣林立，有「無船三百隻」之諺。<sup>93</sup>今屯溪濱江西路一帶位於率水、橫江交匯處的新安江上游北岸，俗稱為「河街」，清光緒年間鋪設街面石板，商行、客棧和運輸行等雲集於此，大量船民、簰工在此居住。<sup>94</sup>寓居江蘇泰州的休寧人程峻僧在 1928 年向子輩介紹家鄉時談到：「屯溪……位六邑之中央，商務極盛，市肆林立，人煙稠密，號稱皖南第二巨埠。」<sup>95</sup>屯溪以洋莊茶業為主產業，帶動錫棧、箱棧等生產服務產業的興起，進而推動各類土產和日用品的出入交流，城市規模逐步擴大，常住人口日漸膨脹，為龐大人口提供生活服務的產業，見縫插針，充分運用城區在茶業及其周邊產業優先發展後的一切時機。至 1934 年時，屯溪有商店 417 戶，從業人員 4,346 人，歸為 60 個行業，除去當年統計中的 14 家茶行、茶號外，其餘生活服務性行業計 59 個，共 403 戶（表 5）。<sup>96</sup>

<sup>12</sup> 月），頁 35-39；黃河濱，〈徽州走馬〉，《旅行雜誌》，卷 27 期 12（1953 年 12 月），頁 29（該文作者黃河濱為休甯藏溪村人）；中國土產公司編印，《中國土產綜覽（初稿）》（內部參考資料，出版地不詳，1951），頁 105-140；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頁 58。

<sup>92</sup> 洪素野，〈皖南旅行記〉（上海：中國旅行社，1944），頁 101。

<sup>93</sup> 張燕華、周曉光，〈論道光中葉以後上海在徽茶貿易中的地位〉，《歷史檔案》，1997 年第 1 期，頁 98。

<sup>94</sup> 參見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省屯溪市地名錄》，頁 9；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 33、109。

<sup>95</sup> 程嵩齡編，《程氏遺稿四種》，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308 種（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 1976 年程大千重印本影印，1976），頁 167。

<sup>96</sup> 14 家茶行、茶號係低估，因為茶號僅在茶季開設，當時的統計難以確定準確數字。

表 5 1934 年屯溪的生活服務性行業

行業	家數	行業	家數	行業	家數	行業	家數	行業	家數
藥材	9	鮮亥	9	紙店	5	醫園	8	燈籠店	3
鹽業	5	車行	3	錫匠鋪	3	官秤	3	茶食店	7
布店	9	紙紮	5	鐘錶	5	鞋店	10	古玩	2
南貨	17	木作	9	爐廠	3	銅匠店	4	漆鋪	4
百貨	20	茶莊	5	棉花	5	做花業	1	山貨店	25
銀樓	8	瓷器	5	米業	13	織帶	3	墨店	3
轎行	5	爆竹	2	麵吃食店	30	筆店	5	衣莊	8
成衣業	28	鑲牙	5	旅館	9	繩索	4	煤油	4
書店	9	糟坊	2	染坊	5	煙筒店	4	對聯店	4
鐵匠鋪	4	鐵行	1	銀行	1	織襪	2	絲線店	5
裱畫	2	洋鐵	5	錢莊	2	肥皂廠	2	典業	1
電池	1	黃煙	10	理髮	14	豆腐店	18	共計	403

資料來源：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110。

1929年4月4日至6日，正當屯溪茶市大忙之時，皖南土匪朱老五糾集流氓地痞百餘人，自祁門竄至屯溪，因向當地商團勒索武器錢財未果，遂將屯溪街市精華付之一炬，浩劫之後，「屯溪已不聞雞犬之聲」。<sup>97</sup>遭此劫難後，屯溪一年之內幾無貿易可言，但是此後三年，「少數浙幫及徽人，鑒於屯埠市場之阨要，認為前途可臻繁榮，於是聯合一般投機□的資本家，在斷風頽垣之大街殘址，建築起高大華洋折半式之商店房屋，將劫後破碎不全舊有市場之痕跡於最短期內掩沒了」，整個城市煥然一新。並趁著當時洋莊茶市的大好局面，

<sup>97</sup> 〈皖匪竄擾徽屬詳情〉，《中央日報》，1929年4月14日，第7版。朱老五本名朱富潤。關於此次屯溪劫難，可詳見《中央日報》中的一系列報導：〈茶業正忙中，屯溪忽遭匪劫〉，1929年4月13日；〈蕪湖快信（四月十二日）〉，4月14日；〈蕪湖快信〉，4月17日；〈蕪湖快信〉，4月23日；〈皖南巨匪朱老五已生擒〉，4月26日；〈巨匪朱老五在皖斬決〉，4月29日。

連年「俱獲厚利，各地農民居戶以所入見豐，對商貨之購買力，較前加強，創後再造之屯埠商業，得茶業景氣之推動，漸回復民十八以前狀態。」<sup>98</sup>從這一段《中央日報》的報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茶業在屯溪各產業中的火車頭地位。本文前文回顧了自明代後期至民國中期屯溪在茶業帶動之下的發展歷程，1929年朱老五一劫後屯溪的迅速恢復，不啻為這一歷程的濃縮版本。潘光旦在1934年春間遊歷屯溪時，曾對那幾年的恢復原因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朱老五的一劫，來勢雖然凶險，元氣卻未大傷，因為匪勢所及得到的不過是財貨一時所積聚的總匯，而不是財貨的來源。所以燒殺摧毀以後，不久就復了舊觀，在不明歷史的人看去，誰也不會知道它是不久以前經過匪災的。」<sup>99</sup>屯溪雖然在劫後迅速恢復，但前述《中央日報》和潘光旦的遊記中，也同樣對1932年後屯溪的再度衰落惋歎不已，而這一次的不景氣，起源於洋莊茶市的疲軟，潘光旦對此評論道：「最近一二年間的不景氣，……已根本影響到了四鄉的繁榮，於是來源既竭，而總匯也就日就枯涸，一時要圖恢復，就大非易事了。」<sup>100</sup>這一段頹勢歷程又再次從反面證明了茶業對屯溪城市發展的龍頭作用。1936年，昭蔚在《徽州鳥瞰》中對屯溪市面總結道：「屯溪為本屬一大商埠，四通八達，市廛櫛比，以茶葉農產品之市價高低，以定本埠商業之盛衰。」<sup>101</sup>

屯溪茶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客商，商人手頭豐綽，又是短期停留，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力在充斥金錢和生人的商業社會中被擊潰。屯溪洋莊茶號內揀茶女眾多，江明恒在〈做茶節略〉中便特意告誡：「揀場、看揀、秤架之人必須正氣為主，不可與婦女談笑攬舞，恐生是非口舌。」<sup>102</sup>「若不是浮梁茶

<sup>98</sup> 〈皖屯溪商業之今昔〉，《中央日報》，1933年2月13日，第6版。

<sup>99</sup> 潘光旦，〈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之二）〉，該文原載《華年》，卷3期18（1934年5月），署名「坎侯」，收入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11，頁94-95。

<sup>100</sup> 潘光旦，〈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之二）〉，收入《潘光旦文集》，頁95。

<sup>101</sup> 昭蔚，〈徽州鳥瞰〉，《綢繆月刊》，卷2期2（1936），頁107。

<sup>102</sup> 江明恒，〈做茶節略〉，收入胡武林編著，《徽州茶經》（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標點本，頁163。該史料亦見於李琳琦、吳曉萍，〈新發現的〈做茶節略〉〉，《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頁114-117。李琳琦、吳曉萍一文的介紹只引用了〈做茶節略〉的部份原文，作者著錄為江明恒。胡武林的《徽州茶經》將〈做茶節略〉全文抄錄，但標題改為《屯緣做茶

客十分醉，怎奈何江州司馬千行淚」，<sup>103</sup>這齣與茶商相關的著名悲劇也同樣在茶務都會的屯溪上演，清末戴啓文有感於當地淫風，曾作《估客妻》一首：

昔非倡家女，今為估客妻。  
估客久不返，隻影成孤棲。  
空房獨宿憐寡耦，弱質歲蕪難自守。  
遂令蕩子舍家雞，野鷺紛飛求匹耦。  
莫謂良人本不良，輕離重別亦尋常。  
誰教荊布蓬門女，學步邯鄲大道倡。

這首詩是戴啓文《屯溪新樂府四首》之一，另三首同樣揭露了清末屯溪迷亂的縱樂場景。

#### 先生旦 鄙士習也

賤業眾所輕，胡為乃有先生名。  
先生自矜貴，胡為混跡優伶隊。  
先生棄書偏愛曲，不作雄飛作雌伏。  
舞態蛾眉妙入時，歌聲鶯舌調尤熟。  
紅氍毹上一登場，如堵來觀興若狂。  
誰信讀書真種子，甘心學樣女兒妝。

#### 賣曲人 警蕩子也

手自弄風琴，口自歌新曲。  
歌成一曲能幾錢，夜夜街頭行躑躅。

節略》，作者著錄為江耀華。據李琳琦、吳曉萍文中的考證，耀華係江明恒的字，故應為同一人。另外，從李琳琦、吳曉萍一文的介紹來看，胡武林在整理時加上「屯綠」倒也沒有歪曲原意。但對照李琳琦一文中的節錄和胡武林所錄的全文，兩者字句出入不少，因一時無法找到更為原始的版本，未能對勘，筆者在使用〈做茶節略〉的部份字句時，將斟酌選擇李、胡兩個版本中意思相對明確的一種，並在引用該史料時，統一著錄為江明恒，〈做茶節略〉。

<sup>103</sup> [元]馬致遠，〈江州司馬青衫淚〉，第3折，收入傅麗英、馬恒君校注，《馬致遠全集校注》（北京：語文出版社，2002），標點本，頁51。

道旁噴噴聞歎嗟，舊是溫飽中人家。  
傾囊弗惜買歌舞，金錢浪擲如泥沙。  
青蚨飛去回不得，坐令生涯棄貨殖。  
可識今宵賣曲人，即是當年冶遊客。

### 朝呼盧 懲博徒也

朝呼盧，暮喝雉，渺渺迷津甘溺死。  
饑無食，寒無衣，空空妙手將安歸。  
遊民齷集賭風盛，廣場大開爭角勝。  
如蠅逐臭蟻附羶，夢到沉酣終不醒。  
博徒貽患須創懲，堂皇高遠如不聞。  
科條佈告有例禁，藐視官法成虛火。<sup>104</sup>

商業的興盛催生娛樂業的發達，讀書人甘願加入藝人的隊伍，市井大眾在工餘以賭博為樂，賭場和風月場的遊戲促成了一樁樁生意的成功，也沙汰著沉迷於玩樂的意志不堅者，從一個特殊的途徑實現了社會的上下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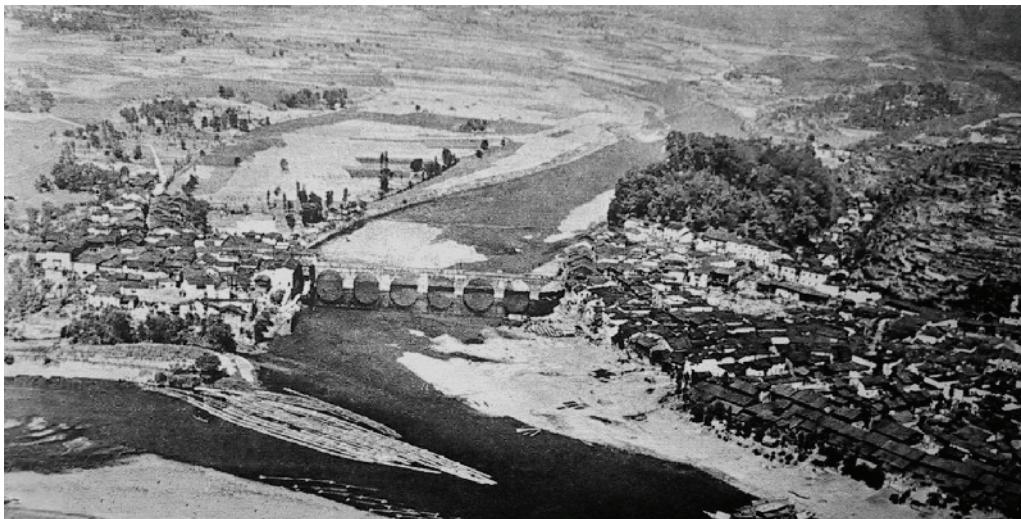
1934 年潘光旦的屯溪一游是與林語堂、郁達夫、葉秋原、全增嘏和金彭年等八人同行的。在郁達夫的紀行中，一行人在酒店中因為是生面孔而被敲去了兩塊大洋，好心人告訴他們，「屯溪市上，無論哪一家大商店，都有討價還價，就連一盒火柴、一封香煙，也有生人熟面的不同。」與清末的情況相同，1934 年的屯溪夜生活也充滿了香豔之氣，一個來自上海有著白相人氣質的小商人，帶他們去屯溪的遊藝場逛了一圈，<sup>105</sup>又到一家舊相識的樂戶，聽了一個「相貌倒也不算頂壞」的姑娘唱幾齣徽州戲。街上還遇見了「三位裝飾時髦到了極頂，身材也窈窕可觀的摩登美婦人」，他們原本是從上海來屯溪遊藝場獻

<sup>104</sup> [清]戴啟文，《新安遊草》，卷下，頁 27 上-28 上。

<sup>105</sup> 屯溪的遊樂場，其正式名稱為「屯溪勸業場」，民間又呼為「屯溪勸業場遊樂園」，1933 年開業，模仿上海大世界，從外地聘請話劇和魔術演員進行表演，故址在今屯溪市新安北路人民影都。參見寧爾蕃，〈屯溪勸業場話舊〉，《黃山》，1990 年第 4 期，頁 34。

藝的坤角，幾番波折後成了街頭的「神女」。白相人還津津樂道著：「這裏有幾家頭等公娼，幾家二等花茶館，幾家三等無名窟，和譸名『屯溪之王』的一家半開門。」夜遊歸來的郁達夫，與朋友臥談起屯溪的街景百態，在朦朧的夢裡念成了一首：「新安江水碧悠悠，兩岸人家散若舟。幾夜屯溪橋下夢，斷腸春色似揚州。」<sup>106</sup>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郁達夫取揚州與屯溪作比，清代的徽州鹽商成就了揚州的春色，而此時，茶商將春色搬到了徽州的屯溪橋下。

圖 6 屯溪橋鳥瞰



圖片來源：韓尚玉撰，盧施福攝影，〈山城春色——屯溪市的新面貌〉所配題圖，《安徽畫報》，1960年第3期，頁25（原畫報無頁碼，該頁數為筆者計數所得）。畫面中上部來水為橫江、左下角為率水，右下角臨江房屋是屯溪河街的一部份，這一帶正是屯溪城市發展的原點，詳見下文。

抗戰爆發後，1938年，國民政府設皖南行署於屯溪，上海、蘇南、浙北及安徽大部淪陷後，徽州處萬山之中，而日軍的佔領區集中於大交通線兩側，

<sup>106</sup> 郁達夫，〈屯溪夜泊記〉（1934年5月），收入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郁達夫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頁485-486。

因而屯溪暫時成了前線中的一隅偏安之地，安徽省主席行署、省黨部皖南辦事處、省直屬屯溪區黨部、省保安司令部和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等，都曾設於屯溪，蘇浙滬的大批官員和商人紛紛來屯溪躲避戰火。<sup>107</sup>洋莊茶葉作為外銷物資，由國家統購統銷，繼續出口。抗戰時期的屯溪，受地理位置的佑護，沒有遭受戰火的直接襲擊，反而成為蘇、浙、滬財富的戰時集中地。而黨政軍機關的設立，在屯溪經濟中心的定位上，又添加了政治中心的標籤。八年抗戰，屯溪的經濟中心地位沒有被削弱，反而為日後逐漸升格為皖南徽州地區的政治中心搭起了基本的平台。

城市發展的一個明顯指標是城區空間的變化，從屯溪空間擴展的進程來看，明代中期的屯溪在今屯溪橋東堍至老街口的一小段曲尺形街道，舊稱「八家棧」。明嘉靖十五年(1536)，屯溪橋建成，八家棧與橋西的黎陽西部地區相連通。<sup>108</sup>自此，屯溪在率水、橫江交匯為漸江的「丫」字相交處開始了城市發展的起步階段。總的發展方向是沿著漸江、即新安江的流向，在屯溪橋東堍、漸江北岸，自西向東、由南至北，逐步擴大，河街、正街、後街，漸次成形。<sup>109</sup>至清末民初時，城區主體南抵江畔河街，北至後街，東西向以西鎮街和屯溪正街為主體，黎陽橋至屯溪橋為西鎮街，屯溪橋至鎮東閣為屯溪正街。<sup>110</sup>民國時期，屯溪城區主體南北方向跨度受漸江岸線與華山嶺及楊梅山的限制，變化不大，東西方向順新安江流水繼續向東擴展，大體至今天的躍進路一線。1949年後，尤其是1980年代後，屯溪城區向東繼續大規模延伸，大體至原屯光鄉里前村、外前村一線，南部通過屯溪新大橋，連通江心洲和漸江南岸的陽湖，北界推至鐵路一線。

<sup>107</sup> 參見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1；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屯溪市地名錄》，頁3。

<sup>108</sup> 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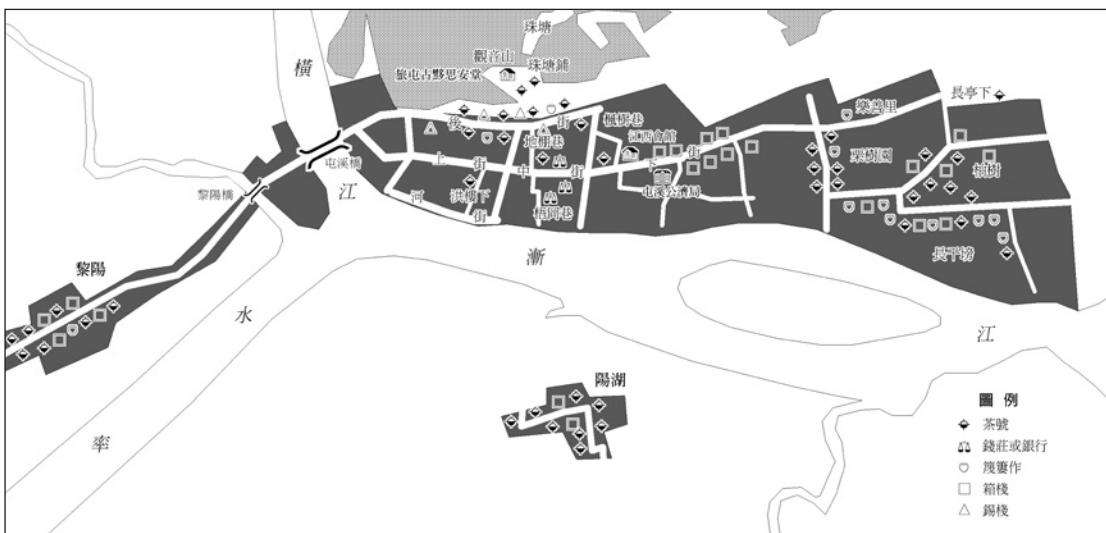
<sup>109</sup> 河街，就是今濱江西路的下馬路口以東段；正街，即今屯溪老街楓樹巷南口以西段；後街，大體相當於今延安路。據1985年11月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屯溪市地名錄》中的多條記載及2006年《黃山（屯溪）市區交通圖》（屯溪，2006）確定，繁瑣考證此處從略。

<sup>110</sup> 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屯溪市地名錄》，頁3。鎮東閣大致在今屯溪老街東段，楓樹巷南口以東85米處，考證從略。

圖 7 明代中期以降屯溪城區的擴展



圖 8 1930 年代洋莊茶業及其周邊產業在屯溪的布局



圖片說明：筆者繪製。因資料來源中各種機構位址的精確度僅至街區，故筆者上圖時，只能在各街區內平均布點。

對照表 1 至 3 所示 1930 年代中期錫棧、箱棧和箋簷作的開設地點，錫棧集中於城區北部的後街和觀音山一帶，錫棧業為黟縣人所壟斷，旅屯黟人設立的新安思安堂和旅屯古黟同鄉會就位於觀音山與後街之間的珠塘鋪，筆者推測，這一帶可能是當地黟縣務工者的一個居住集中地。箱棧多分布於城區東部的下街、長干塝和柏樹。屯溪正街東至江西會館為止，江西會館以東為下街，<sup>111</sup>絕大多數箱棧由江西人開設，箱棧在下街的聚集與江西會館的位置不無關係。長干塝和柏樹基本上是民國期間向東部新拓展的城區，這一帶已漸漸過渡為城郊接合部。此外，箱棧也開設於更偏遠的黎陽、陽湖和羅漢松，這些地方原為屯溪附近村鎮，在民國期間屯溪城區擴展的過程中，逐漸相連而被納入城區之內。與箱棧相似，箋簷作的集中地點也在城區東部的長干塝、樂善里、栗樹園，此外，北部的後街和西部的黎陽也有少量分布。以上為茶業周邊產業的分布地點，那麼，屯溪的洋莊茶號又是開設於城市的哪一個角落呢？《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中留存了一份 1933 年的休寧縣茶號統計，除販客和少數茶號精製地點不明外，其餘茶號均有位址紀錄，從表 6 中可見，休寧茶號全部集中於屯溪。洋莊茶號的分布地點同樣以城區東部的長干塝、柏樹，以及北部的後街為多，與前述各周邊產業的分布地點相似。

總體觀之，屯溪的洋莊茶號以及三大周邊產業——錫棧、箱棧和箋簷作——均偏重分布於城市的邊緣：錫棧分布於北部，箱棧和箋簷作多集中於東部，洋莊茶號在北部和東部均有。其中，錫棧數量較少，且強有力的地緣業緣壟斷限制了同業的增加，同時，城市的向北拓展也受到了山地的阻礙，故錫棧的分布地點呈現出相對穩定的態勢。而箱棧和箋簷作數量較多，開業所需資本較少，同業的限制也較小，因而有著更大的流動性，新入的從業者會依據當時城市功能布局的態勢來選擇開業地點。值得注意的是，箱棧和箋簷作的集中地

<sup>111</sup> 現在的屯溪老街其實只是原來屯溪正街的東段延伸，隨著民國時期老街的興盛，當時人們已經漸漸將正街向東自然延伸的下街也視為正街的一部份。1984 年 6 月 1 日，屯溪市政府頒布〈關於加強保護屯溪老街〉的公告，確定屯溪橋至青春巷口（1949 年前名為公濟局巷）為老街保護區，將原江西會館以東至公濟局巷口的下街正式納入老街範圍，參見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頁 186。

正是當時城市拓展方向的最前沿。這一現象的背後，與其說是箱棧和篾簍作選擇了城市的新拓區，不如說是箱棧和篾簍作逐漸向城郊的推移，確定了城市空間的拓展方向。洋莊茶號每年臨時組設，因而開業亦相對易於隨城市發展而變動，表 6 所見洋莊茶號集中地也在城市的新拓區域中。以製造為特長的主產業和周邊產業締造了城市中心的胚胎，但是，在城市中心商務區日漸成熟，轉變為以生活消費為主之後，主產業和相關周邊產業又會向城郊推移，從而孕育出新的城市胚胎。

表 6 1933 年休寧茶號一覽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吳怡和	吳俊德	2,259	屯溪陽湖	余馨祥	李箬漁	407	屯溪柏樹	日日馨	販客	149	不明
永達祥	洪朗霄	1,790	屯溪石橋頭	咸有禮	王禮周	761	屯溪下黎陽	振華新	販客	38	不明
慎興永	夏再富	1,563	屯溪石橋頭	永大祥	姚文英	670	屯溪羅漢松	永華芳	販客	307	不明
人和永	蘇慕陶	4,979	屯溪長干塝	大華	吳俊卿	1,333	屯溪柏樹	楚記	販客	44	不明
謙吉東	汪秋圃	1,103	屯溪後街	永昌祥	莫鳳山	1,978	屯溪後街	永大	販客	360	不明
華勝	吳佩珩	7,776	屯溪洪樓下	吳茂記	吳子安	2,828	屯溪裏鹽廠	永興	販客	139	不明
怡新祥	孫友樵	4,837	屯溪地棚巷	複昌	吳庭槐	1,197	屯溪陽湖	如松	王翼雲	442	屯溪栗樹園
六泰怡	孫紹堯	2,822	屯溪後街觀音山	一大	孫啓樂	903	屯溪後街	恒德	胡悅齋	272	不明
永泰新	孫紹堯	2,458	屯溪後街觀音山	源記	姚渭璜	1,533	屯溪陽湖	同泰祥	曹壽珍	1,447	屯溪上黎陽
震昌隆	姚錦波	1,350	屯溪栗樹園	永生昌	江仰山	1,891	屯溪下黎陽	大源祥	張彥昭	1,556	屯溪下黎陽九相公廟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牌號	經理	箱額	地址
廣大	程啓孫	552	屯溪太來巷口	進祥	余進春	408	屯溪牌樓前	耀記	販客	82	屯溪下黎陽九相公廟
萬福祥	吳澤民	4,879	屯溪柏樹	宏大	胡魯芹	108	不明	雙龍	販客	142	不明
慎誠祥	胡俊和	1,325	屯溪後街仁豐莊	發芬源	販客	97	屯溪栗樹園	永祥	販客	128	不明
吳永源	吳蝶卿	1,061	屯溪陽湖	永源公	張財貴	699	屯溪栗樹園	康恒馨	販客	127	不明
公興	余守周	636	屯溪陽湖	怡祥隆	許紫華	1,444	屯溪柏樹下	余記	販客	674	不明
裕大	孫毓山	1,342	屯溪陽湖	振華	俞勁純	543	屯溪柏樹下	正祥元	販客	103	不明
振源	孫列五	1,163	屯溪陽湖	同和馨	江浚臣	989	屯溪柏樹下	姚毅記	姚毅全	103	屯溪後街
永華公	曹純卿	4,054	屯溪下黎陽河邊	升芳永	程寶長	1,388	屯溪長干塝中行	恒和永	販客	9	不明
忠興昌	曹政卿	1,347	屯溪陽湖	震泰峰	販客	658	不明	余永祥	販客	35	不明
義芳祥	孫竹庵	2,243	屯溪黎陽打鐵程	森泰永	洪會卿	573	屯溪栗樹園	公同永	販客	492	不明
致昌祥	吳玉川	253	屯溪長亭下	公和興	販客	269	不明	公成祥	洪步丹	1,202	屯溪陽湖
怡怡	姚毅全	2,053	屯溪後街	三益祥	詹禮鴻	175	不明				
致中和	謝在山	1,630	屯溪長干塝	胡永芳	販客	117	不明				

資料來源：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65-67。其中，廣大所在的太來巷口，即楓樹巷口。吳怡和茶號經理吳俊德的事蹟，另可參見王珍，〈吳俊德茶城發跡〉，《黃山》，總第17期（1986年1月），頁27；吳俊德最盛時擁有吳怡和、怡春、華勝（後轉讓給吳佩珩）等6、7家茶號，為屯溪茶界之魁首。

## 五、分析和結論

通過以上研究，我們看到了一個城市的發展進程。屯溪以綠茶精製為發軔動力，隨著這一主產業的壯大，為綠茶精製服務的周邊產業圍繞中心產業而集聚。中心產業和生產服務性產業的運行，吸引了大批外來務工人員彙集於此，並且由季節性務工逐漸過渡為定居土著化，屯溪城市人口因此而不斷膨脹。人流帶來商機，加之屯溪本身所具有的交通優勢區位，其他皖南特產與外來商品也漸漸偏向運往屯溪集散。日漸龐大的定居人口和來往的客商需要穩定的生活保障以及更高的享受追求，生活服務性產業便自然而然地契合人們的生活，在空間上填充了城市在中心產業、生產服務性產業和連帶產業優先分布之後所剩餘的空間。筆者曾對民國時期浙江硤石鎮的空間布局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從中得到與之相似的結論，核心產業支撐起城市空間範圍的基本骨架，生活服務產業完成對城市空間的繁榮填充，這是一種以特定產業帶動城市發展的模式。<sup>112</sup>筆者針對硤石的研究在時段上集中於清末和民國，在這一時段內，硤石的城區範圍幾乎沒有拓展，而在本項屯溪研究中，筆者清理出一個明顯的城市空間拓展過程。明末至民國的四百年左右時間裡，屯溪的社會經濟發展以茶業為先導，落實到具體的城市空間，其拓展同樣以主產業及其周邊產業為先頭部隊。主產業孕育了城市的胚胎，待胚胎成熟之際，它又轉向邊緣，開始新的孕育。成熟的城市中心，因人口集中而以生活消費服務和土地利用集約的金融服務為主，製造業為控制成本，受級差地租的擠壓，逐漸向城市邊緣遷移，但它是城市社會經濟發軔的動力，是城市新空間成長的酵母。

屯溪與硤石還有一段相似的發展歷程，兩個城市原本均非本縣治所，但在特定產業的主導下，逐漸發展成為本縣的首鎮和經濟中心，吸引了區域行政機關的設立，在經過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外力強制變動後——例如抗日戰爭——

<sup>112</sup> 鄭怡，〈民國市鎮的區位條件與空間結構——以浙江海甯硤石鎮為例〉，（上）、（下），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輯 21，頁 145-171，輯 22，頁 31-57。

最終確立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實現經濟中心與行政中心的重合。北京和東京等大都市力圖實現經濟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分離，這是因為這些大都市擁有廣大的輻射面，經濟機構和行政機構相應龐大，兩種功能的重疊造成了城市的不堪重負。而硤石和屯溪只是一個縣級或「府」（地區）一級的中心，相應機構數量有限，疊合分布不致於造成城市機能的癱瘓，反而有利於經濟與行政間的及時溝通和互動。特定的歷史時期只是為重合提供了一個變化的契機，加速了重合的進行。傳統中國的城市，若不是政區治所，不是軍事要地，便沒有城牆建築，屯溪和硤石兩個個案展現了中國無城牆城市成長為本區域政治經濟中心的一種模式。

以上是從屯溪城市單體發展角度入手進行的分析，如果將關注的目光轉向屯溪所處的交通區位，又可以發現有意思的現象。筆者前文利用民國時期的調查材料，已經指出以屯溪為徽州洋莊綠茶中心，在區位上仍有不盡合理的地方：歙縣、績溪，乃至浙江淳安和遂安的大量毛茶需沿新安江溯水而上，運至屯溪完成精製，再依原路順水而下，運往杭州、上海銷售。新安江上游水流湍急，逆流而上困難重重，尤其是浙江淳安與歙縣街口之間的天皇灘、梅花灘，「險惡難上」，街口至深渡間的米灘，亦是「亂石縱橫，狀多怪特，舟行其間，如入八陣圖中，目為之眩焉。」<sup>113</sup>從深渡上水至屯溪的一段河道，總長約 55 公里，「河道曲折，灘多水急，……河床多為卵石夾沙和岩石，有淺灘 16 處，河床落差 42 米」，深渡至街口一段尚可通行 100 噸級的船舶，但深渡以上就只能通行幾十噸的木帆船，枯水季節，甚至只有 5-10 噸的小木帆船可以航行。<sup>114</sup>因而，從運輸便利的交通區位條件來看，屯溪下游的漁梁、深渡等地更適合成為徽州地區的洋裝綠茶精製中心，那樣的話，歙縣、績溪的毛茶便可以避免一段艱苦的上水以及製成後外運的一段回頭路，同時，黟縣和休寧的毛茶也可以輕易地順新安江而下，在漁梁、深渡一帶完成精製，再順水銷往滬、杭。

<sup>113</sup> 錢兆隆，〈錢塘江上流遊記〉，《地理雜誌》，卷 4 期 2（1931 年 3 月），頁 4。關於這一段航道逆水而上的險惡，徽州諸方志和徽州民間路程書中的詩歌描寫俯拾皆是，此處不贅。

<sup>114</sup> 徽州地區交通志編纂委員會編，《徽州地區交通志》（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 172。

圖 9 新安江過灘



圖片來源：《安徽畫報》，1975年第2期，頁29（原畫報無頁碼，該頁數為筆者計數所得），原題為：〈穿過激流險灘，迅速流放〉，為安徽畫報記者攝影報導〈集材與放木〉所配插圖。圖中場景尚為下水過灘，上水過灘之難可以想見。

但是，歷史的選擇就是在屯溪。在屯溪城市發展的起步階段，自然條件和制度條件互相交織，共同奠定了屯溪在徽州茶業中的地位。明代後期創製的松蘿茶帶動了休寧茶業的發展，屯溪控休寧茶產重地率水與北來橫江的交匯之處，為黟、休兩縣水口，自然成為休寧茶業的總匯，就休寧一縣，甚至休、黟兩縣而言，以屯溪為茶葉精製的集中地均十分合適。十八世紀之後，中西貿易興起，外貿的拉力吸引著徽州茶產的外運；但政府出於政治安全的考慮，將對外貿易限制於廣州一地，連南下廣州的路線也限制於內河航線。對徽州來說，最合適的路線就是翻越黟縣與祁門間的分水嶺，進入贛江航線，越大庾嶺南下廣州，屯溪下游歙縣的外銷茶產不得不捨新安江順水不用，反而上水過境屯溪，往黟縣越嶺進入贛江航線。此外，明清兩朝實行茶葉專賣制度，規定茶葉運銷的憑證引由需前往屯溪的太廈巡檢司截角勘合。以上自然和制度的雙重交織力量，將屯溪下游的產茶大縣歙縣也納入其輻射範圍，屯溪開始被塑造為徽州地區，確切地說，是徽州地區新安江流域部份的洋莊茶業中心，與原有的休寧茶業中心地位互相交疊。

上海開埠之後，歙縣的茶葉有了就近下水往上海的可能，無需上水過境屯溪，這對屯溪的徽州洋莊茶中心地位有一定的削弱作用。在清末上海的海關報告中有一個細節，徽州茶、屯溪茶和婺源茶一度三者分列，各有價格，顯然，在當時的上海市場上，這是三種茶葉。<sup>115</sup>對照當時徽州各縣茶葉的外運路線，三種茶葉分列的現象便很容易理解。婺源的茶葉，受太平天國戰事以及九江開埠的影響，在1859年之後取道九江，轉口至上海出洋，婺源之所以不沿新安江下水往上海而選擇長江航線，完全是出於水路方便的考慮，因為婺源屬鄱陽湖流域，與長江水路相連。徽州茶，在當時其實並不是徽州地區茶葉的總稱，而是指歙縣茶葉，因為徽州府治與歙縣縣治在歙縣的徽城鎮同城而治，因此徽州也常常成為歙縣的代稱。<sup>116</sup>歙縣居於屯溪下游，歙縣的茶葉運往上海，完全可以直接從新安江順流而下，不經屯溪，從而在上海市場上形成了徽州茶的單獨稱呼。<sup>117</sup>屯溪茶，顧名思義，就是來自屯溪的茶葉，代表了屯溪上游休寧和

<sup>115</sup> 例如 *Shangha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5* 中開列了當年上海市場洋莊綠茶的價格：“Green tea: Moyunes, Fts. 16.50 to Fts. 32.50; Tienkais, Fts. 18 to Fts. 28; Fychow, Fts. 16.75 to Fts. 27.50....”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冊11，頁204。此處，Moyunes 即婺源茶，Tienkais 即屯溪茶，Fychows 即徽州茶，均為複數形式，Fts 是 HK. Fts 的縮寫，海關兩之意。三種茶葉分列的記載在清末上海的歷年海關報告中多有出現，此處不一一條列。

<sup>116</sup> 例如，祝玉琴的〈閒話徽州〉，實際上就在講述徽城鎮的故事，收入大江編，《戰時皖南行政資料》（屯溪：中國文化服務社皖南分社，1946），頁337-339。該文的第一句話便是：「徽州雖然是一個比不上小上海（屯溪）、小屯溪（淳安）那樣似的繁榮場面」，取徽州與屯溪相對比，可見，狹義的徽州就是指徽州的府城徽城鎮。

<sup>117</sup> 在清末的對外貿易中，徽州經常不能直接等同於整個徽州府。洋商在交易實踐中，實際已經區分出狹義的徽州，有一個細節性的證據，在 *Kiukiang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1* 中提到：“Green tea shows a better record. Although the gains were not large, yet no losses were reported. This business is in the hands of Hui-chou and Moyune Natives, who prepare the leaf at their homes....”（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冊17，頁178）。請注意，Hui-chou 和 Moyune 之間所用的連接詞是“and”，並列關係，這表明在當時的洋商眼中，徽州人和婺源人是兩個地方的商人。筆者推測，這裡的徽州商人可能指歙縣商人，也可能指除婺源、祁門之外，徽州府新安江流域的商人，因為婺源、祁門屬鄱陽湖流域，徽州其餘四縣屬新安江流域，九江是鄱陽湖流域的長江入口，徽州新安江流域前來的商人相對較少，可能會統稱為徽州商人，以示與鄱陽湖流域婺源、祁門商人之區別（1891年時，祁門已改制紅茶，所以在商場中與專做綠茶生意的婺源商人區別明顯）。洋商從交易實踐中有了區分，中國人反而受政區統屬關係的影響，忽視了海關報告英文本中的這個細節，該年九江關海關報告的中文本翻譯為：「業此項綠茶生意者，係徽州婺源人居多，其茶亦俱由其本山所出。」（〈九江口華洋

黟縣的出產，因為這兩縣的洋莊茶葉集中於屯溪精製。

但是，屯溪的洋莊茶中心地位並沒有因為暫時失去歙縣茶的過境而衰落。其中，關鍵的一點在於休寧茶葉在徽州新安江流域保持了產量的優勢。據調查，1933年，徽州新安江流域四縣，休寧縣的茶葉產量為29,300擔，歙縣為18,000擔，黟縣和績溪分別為6,800擔和5,500擔，<sup>118</sup>歙縣產量僅及休寧的2/3左右，休寧一縣所產大體相當於歙縣、黟縣和績溪三縣的總產量。有休寧縣的優勢產量作保證，屯溪的洋莊茶業便能保持穩步發展的態勢，因為屯溪作為休寧本縣的茶業中心，有著水系結構上的天然優勢。屯溪背後穩定的休寧基礎，使得屯溪在廣州外銷時代逐漸形成的中心地位在上海通商時代依舊能夠保持，並以其完備的周邊產業再度吸引下游茶葉入屯溪精製。至民國中期，屯溪歷年茶葉出口恆在7、8萬箱，其中來自休寧以外各縣的約有2、3萬箱。<sup>119</sup>此時，「歙縣所產之茶，大部運往屯溪，為洋莊茶號所採購」。歙縣本地的洋莊茶業以漁梁和深渡兩地最為集中，但是規模要小得多，以洋莊茶周邊產業觀之，僅深渡有福泰和、同盛生兩家錫罐棧和章裕順、大興兩家茶箱作，其餘錫罐、茶箱等還得倚賴屯溪的供給。<sup>120</sup>可見，歙縣的茶葉不僅大量以毛茶形式運往屯溪精製，即便留存於本地的洋莊茶業，也在生產資料的供給上融入了屯溪的輻射範圍。上海通商時代，屯溪再度成為徽州洋莊綠茶中心，吸納下游茶產的勢頭很有可能始於1960-1970年代前後，當時《上海新報》中的茶葉報價單，綠茶分婺源茶和徽州茶兩項，婺源茶從九江轉口而來，徽州茶代表了自新安江運來的上游茶產。<sup>121</sup>對照前文所揭同時代的上海海關報告，或有徽州茶、屯溪茶的分列，或有徽州茶的統稱，故這一時代應該是上海通商背景下，屯溪由休

---

貿易情形論略》，收入《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冊17，頁128）“and”的並列關係在此並不明顯，中文本中沒有句讀，熟悉徽州者反而很容易將其判讀為「徽州的婺源人」。

<sup>118</sup> 李煥文，〈安徽祁門婺源休寧歙縣黟縣績溪六縣茶葉調查〉，《工商半月刊》，紀念號（1936年1月），頁81。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8。經對勘，李煥文一文中數字有印刷錯誤，逕改。

<sup>119</sup> 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頁6。

<sup>120</sup>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歙縣》，頁60-61。

<sup>121</sup> 《上海新報》，1868年7月30日-1872年12月31日，隔日出版，第3版或第4版。

寧茶業中心再度回復為徽州新安江流域茶業中心的過渡時期。

在逐漸完成對徽州新安江流域部份洋莊綠茶業的整合後，屯溪以其產業集聚優勢，又將吸引力擴大至分水嶺以西的另一洋莊綠茶大縣——婺源。何潤生 1896 年的〈徽屬茶務條陳〉中言及：「婺源洋莊綠茶……均由鄱陽湖行運抵江西之姑塘關」，再沿長江航線進入上海。<sup>122</sup>但兩年後程雨亭的〈整飭皖茶文牘〉已經明確提到：「婺源運浙之茶，道出屯溪，向有休寧分局查驗，太廈巡檢衙門掛號之舉。」<sup>123</sup>這一變化表明，大約在 1990 年代，婺源一部份毛茶開始越過五龍山脈入屯溪精製，一部份洋莊箱茶也開始由屯溪轉口沿新安江出境。但根據筆者前文的研究，又不得不在此指出，絕不能高估當時婺源茶葉進入屯溪的數量。婺源茶葉開始大規模進入屯溪集散在 1930 年之後，其間有戰亂導致樂安江商路阻滯的原因，也有江西省在九江高額徵收茶葉轉銷稅的原因。至此，屯溪成為名符其實的徽州地區洋莊綠茶中心。

屯溪從休寧茶業中心演化為徽州地區的洋莊綠茶中心，其交通區位隨著輻射範圍的擴大，也由合理變為不盡合理。歙縣、績溪的毛茶需要克服灘多水急的困難，逆水而上，並在完成精製後原路運出，婺源的茶葉需要翻越高聳的五龍山脈。但是，屯溪以其產業魅力，克服交通阻力，吸收了這幾個地區的茶產。屯溪的魅力來自松蘿茶創製後休寧茶業的發軔，屯溪基於水系結構自然而然成為休寧縣的茶業中心，並以本縣茶葉的產量優勢為堅實後盾，借助政策變遷所帶動建立的良好產業基礎，長期穩步發展，形成產業的積累效應，由主產業至周邊產業及生活服務產業，規模逐漸擴大，成長為專業的製造中心。而這一含納生產、生活配套服務的中心，又成為相鄰地區相同產業共同利用、依賴成長的一條捷徑。產業集聚優勢超越基於運費的交通區位優勢，造就了一個從運費的幾何力學結構而言並不合理的經濟中心布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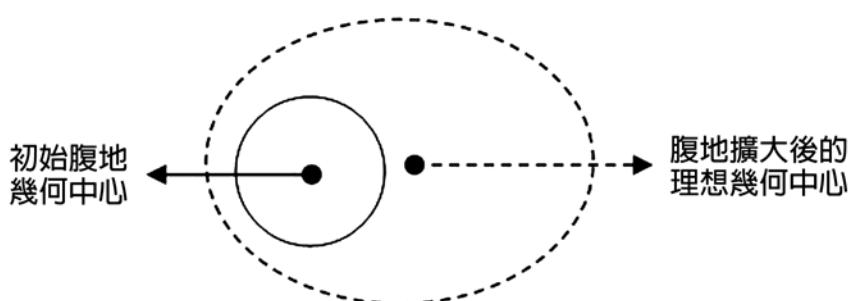
<sup>122</sup> [清] 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光緒二十二年(1896)，收入《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頁 433。姑塘關即江西九江新關。

<sup>123</sup> [清] 程雨亭，〈整飭皖茶文牘〉，原載《農學報》（上海），連載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下旬至閏三月中旬，收入葉羽編著，《茶書集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標點本，頁 545。

表 7 屯溪區位條件演變的三個階段

編號	時段	茶業腹地範圍	區位評價
I	明中期至清前期	休寧、黟縣（合記為A）	屯溪位於天然最優交通中心
II	清中期以後	A + 歙縣、績溪、婺源、祁門 (合記為B)	歙縣、績溪需逆水而上； 婺源、祁門需翻越分水嶺
III	民國時期	A + B + 浙西淳安、遂安，贛東景德鎮	承B所記； 浙西淳安、遂安需逆水而上； 贛東景德鎮需翻越分水嶺

圖 10 腹地擴大後理想幾何中心的偏移



圖片說明：筆者繪製。

回顧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大勢，從杜能(Thüen)圈到韋伯(Alfred Weber)的工業區位論、廖什(August Losch)和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市場論，人們對區位的關注角度，從原料成本到運輸成本，以至市場引力，其本質都是運用力學關係來選擇合理的區位，屯溪成為休寧的茶業中心，應該說符合了這類基於力學的布局方式。但是，從屯溪發展的歷史經驗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在力學幾何中心形成後，其特殊地位將帶來它與周圍其他地點不同的經濟社會積累效應，帶來日益擴大的輻射能力，會推動該中心演化為一個更大區域範圍的中心。新中心的實在地理位置並沒有改變，在擴大的新空間範圍內，它實際上已經偏離了這個更大空間範圍內的最優幾何區位。不過，歷史日積月累形成的產業集聚效應，將鎖定這種幾何意義上並非最優的布局方式，並且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繼續維護和發展該中心的集聚優勢。在經濟史領域中，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了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現象，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便完全屬於外生強加，也必然無法徹底脫離舊有模式。因為新模式的發展必然會依託舊模式中的某些積極因素，而舊模式中的正負效應往往源於同樣的自然、社會基礎，同生同滅。舊模式中的負面因素，在其自然、社會基礎尚未完全消失前，必須被新模式妥協納入，並加以維持，以獲得與它同根而生的正面效應，從博弈演進的角度來看，人們不會為了躲避壞的效應就全盤放棄好的效應，而是願意為了獲取好的效應，暫時同時接受壞的效應。<sup>124</sup>本文對屯溪發展歷史的經驗研究表明，經濟的空間布局中同樣存在著與制度演進相似的「路徑依賴」現象，空間布局所依賴的路徑由原有產業的積累效應所形成。然而從本項研究來看，積累效應的開始仍然帶有很強的歷史偶然性，如松蘿茶的創製、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制定、南下商路的政策限定等等，遠非屯溪一地、徽州一地所能解釋，但是，一旦積累為偶然事件所觸發，其後的發展將依賴著這條路徑而前進。

<sup>124</sup> 參見〔美〕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著，劉守英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144-157；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制度變遷理論綱要〉，《改革》，1995年第3期，頁52-59，該文是諾思於1995年3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演講的錄音整理稿。

這種依賴並非完全基於理性的考量，其原因中同時也有感性的成分。小區域內的幾何經濟中心，在擴大的新區域內雖然成為一個幾何意義上不盡合理的中心，但是它在小區域中心時代中形成的交易習慣，會使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對這一中心的合理感知，直到這份合理感知的地理基礎被完全破壞，而屯溪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步，橫江和率水依舊在屯溪匯為漸江，休寧依然保持著茶葉的高產。相反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屯溪開始了新的優勢積累，它已經從茶業中心發展為徽州地區多種產業的經濟中心，進而取代徽城鎮，成為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筆者前文認為屯溪在整個徽州地區中的區位條件未能達到最優，是從水路運輸角度得出的結論，但是，當代公路、鐵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網的構建，完全以屯溪為中心，依賴歷史路徑的後續發展，又為這一路徑的鞏固維持，拉起了更強有力的新保險索。這段屯溪的現代發展歷程已經超出了本項歷史研究的時段範圍，但它作為歷史的延續，同樣驗證了本文經驗研究所見的「路徑依賴」發展模式。

## 徵引書目

### 一、地方志、地名錄、地圖

- 《黃山（屯溪）市區交通圖》。屯溪，2006。
- [明] 程敏政纂修，《休寧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 29 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影印，1997。
- [清] 何應松修，方崇鼎纂，《休寧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2。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影印，1998。
- [清] 吳甸華修，程汝翼、俞正燮纂，嘉慶《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  
5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影印，1998
- [清] 汪韻珊纂，周溶修，《祁門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5。南京：江  
蘇古籍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影印，1998。
- [清] 馬步蟾纂修，《徽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48。南京：江蘇古籍  
出版社據道光七年(1827)刻本影印，1998。
- [清] 張佩芳修，劉大櫆纂，《歙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232 號。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影印，1975。
- [清] 廖騰煃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90 號。台  
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影印，1970。
- 屯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屯溪市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 屯溪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安徽省屯溪市地名錄》，內部資料。屯溪：編者印行，1985。
- 安徽省徽州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徽州地區簡志》。合肥：黃山書社，1989。
- 許承堯纂，樓文釗、石國柱修，《歙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1。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據 1937 年鉛印本影印，1998。
- 舒斯笏、程壽保纂，許複、吳克俊修，民國《黟縣四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  
5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 1923 年黟縣藜照堂刻本影印，1998。
- 徽州地區交通志編纂委員會編，《徽州地區交通志》。合肥：黃山書社，1996。
- 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黟縣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1，江西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
- [日] 東亞同文會編著，《支那省別全誌》，卷 12，安徽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9。

### 二、史料

- 〈戶部尚書英和等為遵旨會議江海關無令茶船出口事奏摺〉，道光元年(1821)二月二十五日，收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方裕謹編選，《道光年間茶課史料續編》，《歷史檔案》，1998 年第 3

期，頁 18-20。

- 《旅屯古夥同鄉會徵信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屯溪刻本，1920 年第一刻。
- 《新安屯溪公濟局徵信錄》。婺源：婺源縣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七年(1901)刻本。
- 《新安思安堂徵信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屯溪刻本，1920 年第一刻。
- [唐] 楊曄，《膳夫經手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1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影印，1997。
- [元] 馬致遠，〈江州司馬青衫淚〉，收入傅麗英、馬恒君校注，《馬致遠全集校注》。北京：語文出版社，2002。
- [清] 江依濂、江紹蓮撰，〈歙風俗禮教考〉，收入許承堯纂，李明回、彭超、張愛琴點校，《歙事閑譚》，標點本。合肥：黃山書社，2001。
- [清] 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光緒二十二年(1896)，收入陳祖槃、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 [清] 吳騫，《愚谷文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影印，2002。
- [清] 夏之盛，《留餘堂詩鈔二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錢塘夏氏刻本。
- [清] 梁廷枏纂，《粵海關志》，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183 種。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粵東省城龍藏街業文堂刻本影印，1975。
- [清] 程雨亭，〈整飭皖茶文牘〉，原載《農學報》。上海：農學報館，連載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下旬至閏三月中旬，收入葉羽編著，《茶書集成》，標點本。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
- [清] 劉汝驥撰，《陶甓公牘》，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彙編，《官箴書集成》，冊 10。合肥：黃山書社據宣統三年(1911)安徽印刷局排引本影印，1997。
- [清] 潘耒，《遂初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4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刻本影印，2002。
- [清] 戴啓文，《新安遊草》。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一年(1895)徽州屯溪下街黃茹古堂刻本。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鑑 1937 年》，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239 種，上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民國 26 年(1937)版本影印，1987。
- 江明恒，〈做茶節略〉，收入胡武林編著，《徽州茶經》，標點本。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 周駿富輯錄，《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台北：明文書局，1985。
-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休寧縣》，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 9 種，冊 2。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據南京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 1935 年 8 月出版之版本影印，1971。
- 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統計課編，《中國經濟志·歙縣》，收入《民國史料叢刊》，第 9 種，冊 2。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據南京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 1935 年 8 月出版之版本影印，1971。  
程嵩齡編，《程氏遺稿四種》，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308 種。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據 1976 年程大千重印本影印，1976。  
趙爾巽、柯劭忞等撰，《清史稿》，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 三、專書

- 《祁門之茶業》，收入《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叢刊第一種》。上海：中國紡織印務有限公司，1933。  
〔日〕內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觸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學出版部，2001。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美〕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原著，中國茶葉研究社社員集體翻譯，《茶葉全書》。上海：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  
〔美〕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美〕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著，劉守英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大江編，《戰時皖南行政資料》。屯溪：中國文化服務社皖南分社，1946。  
中國土產公司編印，《中國土產綜覽（初稿）》，內部參考資料。出版地不詳，1951。  
中國科學院南方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第三分隊，《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區國土開發與整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 16-20 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安徽省屯溪茶業學校編，《茶樹栽培學（茶葉專業適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編，傅宏鎮撰，《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業》。上海：安徽省立茶業改良場，1934。  
李必樟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 1854-1898 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 6 月。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編，《祁門紅茶之生產製造及運銷》。南京：編者印行，1936。  
洪素野著，《皖南旅行記》。上海：中國旅行社，1944。  
胡武林編著，《徽州茶經》。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郁達夫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 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陳 樣，《安徽茶經》。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

- 陳祖禦、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 葉羽編著，《茶書集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
- 實業部國產檢驗委員會、上海商品檢驗局合編，《屯溪茶業調查》。上海，1937。
- 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鄭友揆、韓啓桐編纂，《中國埠際貿易統計 1936-1940》，收入《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叢刊》，第 1 種。北京：中國科學院，1951。

#### 四、論文

- 〈安徽地理說略〉，《安徽俗話報》，期 12，1904 年 9 月，頁 1-40。
- 〔美〕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制度變遷理論綱要〉，《改革》，1995 年第 3 期，頁 52-59。
- 王 珍，〈吳俊德茶城發跡〉，《黃山》，總第 17 期，1986 年 1 月，頁 27。
- 王振忠，〈清代徽州與廣東的商路及商業——歙縣茶商抄本〈萬里雲程〉研究〉，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輯 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吳智和，〈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明史研究專刊》，期 3，1980 年 9 月，頁 1-74。
- 李琳琦、吳曉萍，〈新發現的〈做茶節略〉〉，《歷史檔案》，1999 年第 1 期，頁 114-117。
- 李煥文，〈安徽祁門婺源休寧歙縣黟縣績溪六縣茶葉調查〉，《工商半月刊》，紀念號，1936 年 1 月，頁 79-90。
- 昭 蔚，〈徽州鳥瞰〉，《綢繆月刊》，卷 2 期 2，1936，頁 107-108。
- 唐立宗，〈省區改劃與省籍情結——1934 至 1945 年婺源改隸事件的個案分析〉，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5。
- 財政部直接稅處屯溪分處，〈皖南特產調查〉，《直接稅月報》，卷 1 期 12，1941 年 12 月，頁 35-39。
- 張燕華、周曉光，〈論道光中葉以後上海在徽茶貿易中的地位〉，《歷史檔案》，1997 年第 1 期，頁 95-101。
- 陸玉麒，〈論贛江流域空間結構的演化過程及其規律性〉，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輯 2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黃河濱，〈徽州走馬〉，《旅行雜誌》，卷 27 期 12，1953 年 12 月，頁 27-32。
- 鄒 怡，〈民國市鎮的區位條件與空間結構——以浙江海甯硖石鎮為例〉，（上）、（下），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輯 21、2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
- 鄒 怡，〈明清以來徽州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6 年 10 月。
- 寧爾蕃，〈屯溪勸業場話舊〉，《黃山》，1990 年第 4 期，頁 34。

趙本一，〈屯溪水運拾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政府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屯溪文史》，輯2。屯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政府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

劉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近代中國城市手藝工人集體行動之分析〉，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錢兆隆，〈錢塘江上流遊記〉，《地理雜誌》，卷4期2，1931年3月，頁1-8。

〈支那の字號、招牌、門票牌子に就て〉，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經濟月報》，總第1期，1927年1月，頁1-8。

〔日〕山根直生，〈唐宋五代の徽州における地域發達と政治的再編〉，《東方學》，輯103，2002年1月，頁80-97。

〔日〕田中正俊，〈「東印度会社の独占——茶の価格」（一八二二年）について〉，收入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編，《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会，1981。

Geertz, Clifford.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0:3, April 1962, pp. 241-263.

Hamilton, Gary G. "Reg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3, July 1979, pp. 346-361.

Hollingworth, H. G. "List of the Principal Tea Districts in China and Notes on the Names Applied to the Various Kinds of Black and Green Te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 1875, pp. 1-15.

## 五、報紙、畫報、數據庫

《上海新報》，1868年7月30日至1872年12月31日。

《中央日報》，1929年4月13日、4月14日、4月17日、4月23日、4月26日、4月29日；1933年2月13日。

《農村合作》，卷2期3，1936年10月，插頁。

韓尚玉撰，盧施福攝影，〈山城春色——屯溪市的新面貌〉，《安徽畫報》，1960年第3期，頁25（原畫報無頁碼，該頁數為筆者計數所得）。

安徽畫報記者攝影報導，〈集材與放木〉，插圖〈穿過激流險灘，迅速流放〉，《安徽畫報》，1975年第2期，頁29（原畫報無頁碼，該頁數為筆者計數所得）。

《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

## Industrial Cores and Urbanization: The Tea Industry in Tunxi, Huizhou, 1577-1949

Zou Yi\*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unxi, originally a small market town in the Xin'anjiang River valley in Huizhou, into a center of the tea industry began in the Hongzhi Reign (1488-1505)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ocal tea industry took off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ngluo tea from Xiuning. Tunxi, as a waterway hub, became the seat of Xunjiansi, a government agency operating *chayin*, or licensing of the tea trade. Tea produced downstream in Shexian generally did not pass through Tunxi, but with the channeling of the foreign tea trade through Guangzhou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l area teas were first gathered in Tunxi before transshipment to Guangzhou. Related industries boomed, such as tea tin, wooden box, bamboo basket and financial products,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Anhui,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e centraliz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consolidated Tunxi'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Even after Shanghai was opened as treaty port and tea produced in the lower reaches could have been directly shipped there, it was still shipped upstream to Tunxi for refinement.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unxi demonstrates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institutional formation.

**Keywords:** Huizhou, Tunxi, tea, path dependence, urban history

---

\*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